

2026年10月刊

布尔什维克月报

Ежемесячный Большевик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布尔什维克》月报

Ежемесячный Большевик

2026年10刊

我们是谁:

当前，世界资本主义处于危机的时代，亦是阶级斗争愈演愈烈的时代。能够更换天地的工人阶级力量，唯有匹配上最能引领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即布尔什维克式的革命党，才能终结资本主义对人类文明的摧残，带来社会主义的新生！
要建立先锋队，首先要抓紧理论斗争。《布尔什维克》旨在传播分享革命马克思主义思想，致力于使革命马克思主义思想成为中国阶级斗争的理论参考点，成为激进层、工人阶级乃至劳苦大众眼中解放社会的可见纲领和指针！
革命理论的传播需要更多的助力，如你也是同志，请联系我们、订阅《布尔什维克》月报、将我们的文章和频道转发给更多的左翼群体！或者向我们投稿！

官方网站：https://bolshevik.red/
联系与投稿邮箱：bolsheviks.red@proton.me
月报订阅邮箱：bolsheviks.sub@proton.me（订阅方法：向该邮箱发送任意内容邮件，亦可通过本刊电报和推特频道下载）
电报频道：https://t.me/bolshevik_red
推特频道：https://x.com/bolshevik_red?s=11
书籍推荐：《中国：从不断革命到反革命》
往期杂志：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第四期，第五期，第六期

目录

原创

1. 社论：红色是十月的颜色！ 7

2. 十月风暴？革命青年指引方向..... 11

3. 习特二会：帝国主义角力中不甚了了的幕间休息..... 15

4. 尊界V800汽车：世界第一的电动车行业到底在为谁而生产？ 21

5. 中国与俄乌战争..... 27

6. 真实的鲁迅-历史转折点的革命文豪..... 39

转载

7. 欧洲的红色之秋 49

8. 看清美国帝国主义的兴与衰..... 61

专栏

9. 阶级斗争专栏：为什么现在还没有革命？我们又为什么需要革命的领导？ 77

10. 共产主义问答：当今中国严重的生育率问题，是否是女性追求地位提升的必然结果？ 93

经典

11. 托洛茨基与今日世界的关联..... 97

社论：红色是十月的颜色！

《布尔什维克》编辑部

这又是一个红色的十月。

在中国，自1949年开始，每逢十月初我们都庆祝人类历史上第二伟大的事件：中国革命。虽然讽刺的是，我们是在中国资本主义内庆祝那推翻了彼时资本主义的中国工人国家的诞生。但1949年那场伟大革命的记忆仍鲜活在我们的头脑中，甚至随着资本主义的乏力而愈发让年轻人回望：去年就有数万青年人聚集起来纪念毛泽东的诞辰，那是对中国革命的致敬和向往。

在中国，1949年革命的光辉正在年轻人的头脑中复苏。而在欧洲，革命的光辉不只是在头脑中，更是在街头上开始展露。此时此刻在欧洲此起彼伏发生的青年抗议斗争，一如马恩近两百年前写下的字句：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

法国几十万抗议的学生在楼顶用红漆写下“Vive la Commune”（公社万岁）向巴黎公社致敬，他们挥舞着红旗喊出要“6-7世代要再来一次68年五月”。西班牙由于住房问题开始的抗议队伍中满是红色旗帜，共产主义热情随处可见。两国青年在斗争中都迅速提出要总罢工并已迫使两国的大型工会响

应。如今群众斗争的蔓延之势，如《欧洲的红色之秋》文章所言：整个欧洲都在燃烧。

> “这将是一个非常火热的秋天，颇有1968年的味道。在法国、西班牙、葡萄牙、比利时、希腊、意大利、爱尔兰、塞尔维亚、阿尔巴尼亚等地，运动已经爆发。其他各地也遍布同样的易燃物。”

并且，这一波Z世代革命的浪潮不仅限于西欧。如魏希醍同志《十月风暴？革命青年指引方向》所言：

> “当下，大型群众斗争也在西欧之外蔓延。从邻近的阿尔巴尼亚到地中海对面的突尼斯，大西洋彼端的智利、阿根廷、巴西、哥伦比亚、玻利维亚、墨西哥，到地球另一面的印度。不管这些事件的引爆点之间有什么偶然不同，其背后都显示了工人和青年们从反抗到试图打倒他们的统治者的物质和意识进程。”

而在群众斗争的背后，是劳苦大众的生活在资本主义深刻危机下日益恶化至不可忍受。资本主义危机的本质是生产过剩。今日，它随着不断的借贷续命而大得史无前例，以至于世界市场对于整个资产阶级来说过于狭窄，这就必然日渐推高的资产阶级国家之间的竞争。中美对抗就是其最突出的表达，且正深刻改写着旧的资产阶级国际秩序。

今年9月末习近平和特朗普的第二次会面，再次确认了在对抗关系内，面对世界第一的美帝，中国仍正在占上风。被国内经济、伊朗战争、中期选举多重缠身的特朗普如变色龙般展示了对习近平的友好，尤其希望习在伊朗问题上帮帮忙。但这是否意味着中美转向友好？约翰奈斯·西拉潘同志在《习特二会：帝国主义角力中不甚了了的幕间休息》内清晰地指明：

> “这些看似缓和的表态，并不意味着中美之间的帝国主义冲突已经进入了一个长期稳定的阶段。”

因为这背后是任何亲昵外交辞令都解决不了的物质问题：对世界市场的瓜分竞争。

今日中美对抗的决定性要素是美国的相对衰落。就此，我们特地转载革命共产国际台湾网站“火花”的优质文章《看清美国帝国主义的兴与衰》，为同志们展现今日头号帝国主义自美国革命至今的完整兴衰过程，尤其是指明今日导致美国衰落的去工业化、金融化的物质性进程，恰恰是资本主义逻辑的演绎，这也恰恰反过来孕育着美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种子。

而在中美对抗的另一头，中国统治阶级确实能暂时得意。这种得意不仅来源于贸易战的胜利，其盟友俄罗斯在俄乌战场上的胜利也为其增加底气。事实上，持续数年的俄乌战争同样是我们时代的另一巨大事件，它深刻暴露了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弱点，加速了中国和俄国两大新帝国主义的崛起。中国虽不直接在战场内，但却是其中重要的利益方。就此，喀秋莎同志的长文《中国与俄乌战争》仔细重新回顾俄乌战争的缘起，其过程内中国统治阶级的利益关切、参与和得到的教训启发，以及今日战局对中国、世界格局及各国工人阶级的意义。

但是，世界格局上的风光解决不了中国内部越来越无法掩盖的资本主义矛盾。其社会性的危机症状包括生育率的迅猛下跌。有人下结论说是女性的问题，她们不想生。但真的是这样吗？我们本期的共产主义问答：“当今中国严重的生育率问题，是否是女性追求地位提升的必然结果？”将就此给予马克思主义的解释。

但从深层去说，中国资本主义的核心矛盾依旧是生产过剩，其表现尤为突出和严重的部门即是中国的电动车行业，而这个部门最近也闹出了尊界V800的笑话，直指整个电动车行业的生产存在隐患。生产过剩到底怎么和踏板易碎产生联系？明太鱼同志在《尊界V800汽车：世界第一的电动车行业到底在为谁而生产？》一文内具体地回答道：

> “长期以来，中国通过政策，资本和强大的供应链成功把新能源汽车做大了，但是产业扩张的速度，远远超过了市场淘汰、行业消化产能、市场需求和重新分配利润的速度。路透社基于33家中国上市车企的报告指出，在2019年，这些车企的净利润率中位数仅有2.7 %，在2024年更是下降到0.8 %，也就是说，对于例如处于中位数的企业来说，每实现100元收入，净利润只剩0.83元，香港大学在2024年的调查更是显示，2024年中国129家新能源汽车制造商中，只有三家实现盈利。在资本主义下，如此竞争压力下能活下来的不是那些能生产最高质量产品的企业，而是最能保住利润的企业，这势必意味着某种程度的扩大生产量和偷工减料。”

不过，既然今日中国也存在和如欧洲一般的资本主义矛盾且也日益加深，那为什么抗议不在中国发生？就这个常见的问题，我们特意转载革命共产国际两位重要理论家的文章各一篇：艾伦·伍兹的《为什么现在还没有革命？我们又为什么需要革命的领导？》，并辅以泰德·格兰特的《托洛茨基与今日世界的关联》。

另外，转载艾伦的这篇文章，也意味着本月报的理论专栏主题的更新：阶级斗争专题！我们上一个阶段的女性解放专栏就此告一段落，但如果同志们想就这个重要理论领域继续学习探索，请使用我们的网站汇总链接，里面包含许多月报来不及转发的重要材料。而就我们的新阶级斗争专栏，欢迎同志们投递问题来丰富我们的选题。

红色的旗帜飘扬在欧洲和世界各地青年人的斗争阵列之中，也飘扬在中国来提醒我们1949年那场改变中国的革命。而红旗曾飘扬过的最重要的那个十月，正是人类历史最伟大的事件俄国革命的（儒略历）出生月份。

如今，斗争和革命不再只是过去的记忆，它正重新回到这个世界的新一代身边。激进的青年一代要用理论武装好自己的头脑，才能在未来在无产阶级斗争的队列中高高地扛起革命的红旗。

十月风暴？革命青年指引方向

魏希醍

> 凡尔赛政府叫喊道：“这是纵火！”同时悄悄地示意它所有的、直至远在穷乡僻壤的走卒，要他们在各个地方把它的敌人都当作专事纵火的嫌疑犯加以搜捕。 全世界的资产阶级看着战斗结束后的大屠杀感到开心，而对人们“亵渎”砖瓦和灰泥却万分愤怒！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

> 一把万能钥匙怎能同一张股票相比？抢劫一个银行怎能同开办一个银行相比？——布莱希特，《三毛钱歌剧》

“骚乱！”、“极左！”、“移民！”从巴黎到华盛顿，从布鲁塞尔到北京，全世界的资产阶级政客和媒体都联合起来谴责上周末在欧洲各国爆发的巨大群众抗争。中国的秩序党与自由派小资产阶级也缩在被窝里瑟瑟发抖：“乌合之众”多么可怕！幸亏我们身披“中国制造”的专制锁链呀！

仅在法国一地，10月17日的抗议就动员了近百万人，高于10月6日的45万人。这场自9月的郊区高中生示威开始的运动早已扩散为包括大学生、工人（特别是教师）和退休人士的反马克龙政府、反资产阶级紧缩政策的群众运动。游行、封锁、罢工此起彼伏，并扩散到意大利、比利时、希腊等国——已经被政府和资本家对玛丽卡门的驱逐、谋害所激怒的西班牙群众自不用说。五月风暴的幽灵再次在欧洲上空游荡。

如今在欧洲各国爆发的社会愤怒已经积累了至少一代人的时间：经济停滞、基建破败、贫富分化、社福削减、生活成本高涨，欧洲资本主义的衰败早已一览无余，再加上近年来军国主义和最赤裸的种族主义的重返。因为教师短缺，法国全国有10%的中学课时被取消——在贫困的Seine-Saint-Denis，这个数据高达20 %。“可是”，资本的卫道士告诉我们，“青年人的未来和LV、爱马仕的神圣财产权利比起来，又算得上什么呢？”

我们的阶级敌人很清楚自己的虚伪。早在10月17日之前，警察就残暴地殴打、逮捕了成千上万的未成年人，有些孩子们甚至被警察打瞎眼睛，打断手臂。如今他们却指责示威者使用“暴力”！同时，他们完全明白，群众示威和在夜间对商店的洗劫并非同一场运动——要是政府不把精力放在和和平示威者作斗争上面，还能多保下一些他们资产阶级主子的利润——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把责任统统推给斗争的学生、工人和所谓“激进左翼”。

在低劣的障眼法之下，资产阶级正加大镇压力度。他们知道，任何让步都会让工人阶级更加大胆地提出自身诉求，因此必须用警棍、震爆弹、催泪瓦斯和水枪——倘若不需要荷枪实弹的话——来扼杀运动，以儆效尤。在法国，马克龙已经颁布了宵禁，意大利的梅洛尼似乎也将效仿。

与此同时，主要工会的领袖们还在消极等待。法国总工会（CGT）仍保持其11月5日的总罢工日期。意大利的CGIL则把总罢工日期定在11月20日！作为整体的工人阶级无法永远保持斗争热情。现在，工会官僚的拖延对于运动来说是不亚于政府镇压的危险。推动运动趁热打铁并继续扩大范围是革命左翼当下的迫切任务。

另一方面，全球金融市场的大神们已经透过抛售法国国债对马克龙下达指令：再不紧缩就砸你饭碗。统治阶级政客绝不像他们表现的那样胸有成竹。要讨好债券市场的投机者，他们不得不对群众摆出强硬、不妥协的态度，但是这无疑只会进一步加剧其政治破产——无论是建制派还是现存的右翼民粹反对派。无论眼下运动直接的成败如何，资产阶级的统治都再不可能“照过去方针办”。持续的政治动荡是不可避免的。

当下，大型群众斗争也在西欧之外蔓延。从邻近的阿尔巴尼亚到地中海对面的突尼斯，大西洋彼端的智利、阿根廷、巴西、哥伦比亚、玻利维亚、墨西哥，到地球另一面的印度。不管这些事件的引爆点之间有什么偶然不同，其背后都显示了工人和青年们从反抗到试图打倒他们的统治者的物质和意识进程。让任何以为世界革命是某种乌托邦理想的人，清楚地看看现在我们活生生的世界吧。

1968年在欧洲开启了一整个革命运动的时代，当下的运动也同样有此潜力。在组织水平上，今天的工运和社会主义运动离其前辈仍有不小距离。但比起60年前，今天的革命学生和先进工人更加亲近，也更少对资本主义制度存在幻想。时间站在我们这边。实现《共产党宣言》内那句“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已经成为一代年轻人们为之奉献的事业。

习特二会：帝国主义角力中不甚了了的幕间休息

约翰奈斯·西拉潘

美国东部时间9月23日，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打破64年来的外交惯例，亲自前往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迎接习近平。此次访问是对5月特朗普访华的回访。

两国领导人在公开场合使用了颇为亲密的外交辞令，似乎一度扫去了贸易冲突的阴霾。习近平在致辞中表示，中美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并指出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然而，这些看似缓和的表态，并不意味着中美之间的帝国主义冲突已经进入了一个长期稳定的阶段。

的确，在短期之内，不同国家的资本家确实能够就如何瓜分世界市场达成一定程度的共识。然而，这种暂时的妥协从来都不意味着帝国主义之间的根本矛盾已经消失。中美两国的资本家甚至尚未进入一个长期僵持的停战阶段。尤其是在今天美国国际地位和工业生产水平相对衰落的背景下，这一点更加明显。正如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所指出的，两个强大的垄断集团托拉斯瓜分世界这一事实，当然并不排除世界被重新

瓜分的可能性——只要彼此之间的实力对比由于发展不平衡、战争、崩溃等等因素而发生变化。

不平衡的贸易战

2025年以来，中美帝国主义的长期角逐日益激烈。其中一个重要背景便是中国工业乃至金融地位的显著提升。特朗普也试图兑现其在竞选期间作出的所谓“振兴本土工业”和对外强硬的承诺，并通过贸易壁垒不断试探和限制以中国为首的世界各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影响力。

2025年4月，中国商品面临的关税一度达到145%，而北京则对美国进口商品征收125%的关税，同时收紧稀土出口。显然，这场战斗对中美双方的影响都过于巨大。中国的工业产能之庞大，使全球市场的其他部分难以完全吸收。但与此同时，对美国而言，中国制造品的物美价廉仍然难以替代，又在工业生产的各个环节掌握着包括稀土在内的一系列关键产品的命脉。

双方于10月在韩国举行会谈后便达成了关税休战协议，该协议原定于11月10日到期。尽管如此，中美贸易额仍大幅下降，较前一年减少了近3 %。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却明显增长，并于去年实现了高达1.2万亿美元的全球贸易顺差。

在此次会晤中，美中两国同意将贸易休战协议再延长两个月。这一协议将使美国和中国能够暂时搁置分歧，以分别应对各自国内和国际政治日程：美国需要迎接将在迈阿密举行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以及更加紧迫的中期选举。最新民调显示，特朗普支持率已降至37%，创下《华尔街日报》自1990年以来历次中期选举前民调的最低水平。而对中国而言，则包括10月26日至29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共二十届五中全会，以及11月18日至19日在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在中国外交部发布的八点共识中，两国达成了所谓“300亿美元”的对等降税安排，并同意延期落实包括TikTok议题在内的吉隆坡经贸磋商成果等。但值得注意的是，中方此次并未携带资本家代表，与以埃隆·马斯克、黄仁勋等人为代表的美国资产阶级共进晚宴，进行磋商。所谓300亿美元的象征性贸易订单也不过是九牛一毛，甚至其能否真正落实，也值得怀疑。美国参

议员塔米·达克沃思周二在美国进步中心（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智库的一场活动上就表示：“如果看看他们上一次峰会的结果，当时双方承诺中国将购买200架波音飞机以及价值170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但这两项承诺都没有兑现。”

超级智慧

除此之外，共识中也提到了引起媒体高度关注的人工智能问题。讽刺的是，在双方彼此缺乏信任的情况下，两位领导人恐怕反而花了更多时间讨论如何给AI重新命名。特朗普说：“他（习近平）似乎和几乎所有人一样，喜欢把‘人工智能’（AI）一词，改称为准确得多的名词‘超级智能’（Super Intelligence）。两人以同样“拖延症式”的方式，将进一步的对话推迟到今年11月举行，提出建立所谓的“人工智能事件沟通渠道”，通过一个个委员会和一场场会议，用更抽象的伦理问题掩盖了对AI未来泡沫的不确定性。

事实上，相比于不受限的金融投机本身，中美双方内心所想的，都是本国资本在先进生产资料军备竞赛中的表现。多年来，华盛顿一直限制中国购买人工智能发展所需的最先进半导体。今年，美国还禁止销售中国制造的人形机器人。美国以侵犯知识产权为由，占据资产阶级道德制高点向中国施压；与此同时，中国也重点批判了部分美国资本家对于中国人工智能发展会构成“严重威胁”的评估。政治风险咨询机构欧亚集团（Eurasia Group）的中国事务主管阿曼达·肖也表示：“双方之间存在大量不信任，这阻碍了合作。中国方面倾向于认为，美国提出安全标准，或者企业呼吁放缓前沿技术的发展步伐，实际上都是在试图压制中国的发展。”

帝国的疆域

另外，在共识中两国元首也同意，伊朗应履行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任何国家或机构都不得对国际水道征收通行费。事实上，尽管中美是经济和军事影响力上的直接竞争对手，但在维持国际金融市场以及大宗商品市场的基本稳定方面，双方仍存在共同利益。

就在此次峰会举行前不久，特朗普刚在联合国的一次演讲中强硬为自己动用军事力量的做法辩护，并暗示美国可能“彻底摧毁”伊朗。然而，面对习近平时，特朗普的语调明显更加温和。中国是伊朗最大的石油买家，也是伊朗最大的贸易伙伴。特朗普于2月对伊朗发动袭击后，据报道，中国曾在幕后向德黑兰施压，促使伊朗回到谈判桌前。

尽管在美伊签署一份看似结束战争的《谅解备忘录》（MOU）不到一个月后，双方敌对行动仍在以色列种族屠杀者的鼓动下持续。康奈尔大学政府学副教授艾伦·卡尔森指出，随着伊朗战争持续，美国军火消耗的速度已经超过补充速度，而中国掌握的稀土资源对于美国补充军需品而言变得更加重要。与此同时，习近平正试图将中国塑造成一个相较于“反复无常的美国”更加稳定的选择。

在台海方面，对台军售方案仍然悬而未决，本可能成为此次会谈中北京施加压力的重要筹码。早在今年5月，特朗普访华时便已经作出了重大的姿态性让步。相较于此前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似乎更容易在这一问题上作出松动。外界原本预计，习近平本周会要求特朗普停止向台湾出售武器。特朗普5月访问中国后曾表示，他暂缓了一项价值约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计划，并称这是一张“非常好的谈判筹码”。但特朗普最终也并未如中国所愿作出实质性让步，而是选择将台湾问题暂时搁置一边。

把酒言欢后的阶级矛盾

帝国主义不是静态的、永远固定不变的东西，而应被理解为不同帝国主义列强为瓜分和重新瓜分世界而展开的动态斗争。起初，中国政府并不确定该如何应对特朗普，甚至一度担心其反华政策。但如今，二人举杯祝酒，面对拜登自动签字笔的照片谈笑风生；特朗普则以恭维和款待回应早先访华时受到的礼遇。严肃议题讨论了也没有出路，自然只剩下对个人兴趣的迎合和中秋祝福歌曲。与此同时，中美两国的工人阶级面对日益激烈的阶级冲突、不断扩大的亿万富翁阶层财富积累以及自身的无产阶级化，正在积攒越来越多的愤怒。

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未来将走向何方，并不取决于特朗普或习近平如何看待这段关系。中美两个大国都处于深陷危机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之中。尽管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声誉目前正处于上升势头，但其经济增速正在放缓，青年失业率接近20%，同时还承受着残酷的工作时长和日益严重的剥削。美国同样面临日益激烈的阶级矛盾，以及对外军事野心受挫、通货膨胀和迫在眉睫的债务危机。

将实行资产阶级民主的美国资产阶级，与同波拿巴主义专制深度绑定的中国资产阶级相比较，也可以看到：在帝国主义时代，两者之间巨大的政治差别已经大大减弱。这并不是因为这种差别根本不重要，而是因为在所有这些场合，真正起作用的都是具有明显寄生性特征的资产阶级——他们的代表完全可以在同一张酒桌上把酒言欢。而中美乃至世界无产阶级只有把自己的命运把握在自己手里，才不会任由嗜血嗜利的资本主义轻佻地摆弄世界的命运。

尊界V800汽车：世界第一的电动车行业到底在为谁而生产?

明太鱼

本月初，中国知名汽车测评博主“懂车帝”发布了针对由华为和江淮汽车合作的“尊界V800汽车”的测试视频。该车型是华为主导的鸿蒙智行旗下定位最高的品牌，售价76.6万至101.6万人民币，被华为常务董事余承东称为“全世界最顶级的MPV”。可遗憾的是，这辆车交出的是一份可笑的答卷，在视频中，博主连续测试了三台全新的尊界V800，其刹车踏板全部断裂，且断裂部位高度一致，暴露了制造商的整个生产过程都值得担忧。该视频在发布后于十月八日迅速冲上微博热搜，群众的情绪从一开始的震惊和愤怒，迅速扩散到了对生产商，对电动车行业，乃至对中国整个工业体系的不信任。

群众和资本家的舆论攻防战

面对这番态势，资本主义选择立刻解决提出问题的人，堵住群众的悠悠之口：该视频迅速下架，讨论该事件的帖子被删除，媒体选择沉寂或辩解，甚至有疑似水军的账号说，是测试员踩得太猛，普通人最大踩力不超过400牛；说懂车帝用液氮把踏板冻脆了；说测试员是日本人，是”境外势力”破坏国产品牌；或呼

吁”给民族工业一点时间”…… 然而，这些努力不过是螳臂当车，华为在百般挣扎后最终也没有得到群众的一点面子。

民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不难看出，这个对外宣称民族之光的品牌表面上大义凌然，实际上转眼就在资本的赌桌上用国民的生命安全作为赌注，换取不义之财。虽然“懂车帝”的视频已被下架，任何批评的声音也被抑制，但是广大群众仍然发挥出了无比的创造力与幽默感，如同先前调侃许家印“空城计”那般，用各种他们能想到的方式去对尊界的闹剧冷嘲热讽，以表达对资本家的鄙夷和不信任。

这说明民众意识到，华为首先是资本家的，其次才是中国的。

问题重重的中国电动车行业

其实，这不是中国电动车行业的问题第一次暴露在群众面前了。在2025年3月和10月分别发生了两次小米SU7碰撞事故，小米出于成本控制没有安装物理杠杆车门，从而导致驾驶员和乘客在事故中因为电车门断电而被锁死，继而被活活烧死在车中，2023–2026年中电动车更是屡次发生电池热失控自燃事件。这一件件事故证明，中国电动车行业的整体制造流程都存在着深刻的问题。

长期以来，中国通过政策，资本和强大的供应链成功把新能源汽车做大了，但是产业扩张的速度，远远超过了市场淘汰、行业消化产能、市场需求和重新分配利润的速度。路透社基于33家中国上市车企的报告指出，在2019年，这些车企的净利润率中位数仅有2.7 %，在2024年更是下降到0.8 %，也就是说，对于例如处于中位数的企业来说，每实现100元收入，净利润只剩0.83元，香港大学在2024年的调查更是显示，2024年中国129家新能源汽车制造商中，只有三家实现盈利。在资本主义下，如此竞争压力下能活下来的不是那些能生产最高质量产品的企业，而是最能保住利润的企业，这势必意味着某种程度的扩大生产量和偷工减料。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到：

> “资本家为了在竞争中维持自身，必然通过降低商品的价格来争取市场，这促使他不断降低生产费用。”

因此，即便华为将汽车的价格定到了百万，为了在和同行竞争中保住利润并抢占市场份额，将大量研发资金投入到汽车的软件化和智能开发中。于此同时，也是为了在国际市场中占领份额，中国电动车行业为了避免在德国日本擅长的燃油车领域正面竞争。面对基本的安全性能，资本家抓破了脑袋也找不到理由在安全上多加一道检测和加固程序。从研发上我们就能管中窥豹：根据麦肯锡在2025年8月的报道，传统汽车行业则需要40–50个月，而中国汽车行业在研发上从概念到上市用时仅24个月，其中大量提前发现的问题其实是通过仿真和虚拟原型，而非真实测试。

而这样对利润望眼欲穿的渴望，也最终会纵向传导到整条产业链条中，形成一张多米诺骨牌：像华为这样处于垄断地位的企业，另一个保利润的手段便是压榨上下游企业的供应价格，逼得整条产业链条的利润被压缩。根据CnEVPost的报告，仅仅是电池，华为鸿蒙就在今年继续引入了中创新航、国轩高科等供应商，其中部分新供应商的磷酸铁锂电池报价比宁德时代低10%，这又会让供应商不得不在降价的同时保住利润，而这时，利润的代价从哪里来？从更放肆的偷工减料和高额压榨工人中来，也就是从你、从我、从中国工人阶级的血汗中来。

不要拿特斯拉转移话题

10月15日晚，美国特斯拉发布新款Roadster，演示车辆利用压缩气体推进器短暂离地、翻转及着陆。部分中国网民随即把尊界争议与中美汽车产业竞争放在一起讨论，“我们连刹车踏板都无法保证，他们的汽车已经能飞？”成为当时流传最广的评论之一。

一些自由派对此新欢鼓舞，认为这是美国资本主义优越于中国制度的又一体现。一些官媒也因此开始惶惶不安，放下了此前看似中立的，对“速成车”现象的批评，转而开始为尊界的事故打圆场——在帝国主义利益面前，官方和中国资本家的利害终究还是一致的。

但今天的中国无产阶级没有那么容易被崇洋媚外或者“民族利益”的思想唬住。大部分网民非但不对上述双方的言论买张，对尊界的调侃与嘲讽反而变本加厉了。

群众不再被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宣传转移视线，说明他们紧紧地抓住了问题的关键点：现在是中国的资本家和官僚在谋财害命，我们在说这个重要的问题，别拿美国人来转移视线！这多么好地反映了无产阶级革命家李卜克内西那句名言的真谛：主要的敌人在国内！

官媒固然也可以炫耀假惺惺地承认中国电动车行业的发展，但它们无法解释的是，为什么拥有如此强大生产力的中国资本主义却还是闹出了尊界此般的闹剧。中国当前的生产力本可以进一步发展，并真正意义上惠及无数劳苦大众。然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无序竞争却只会局限这一生产力的发展，并为工人阶级带来数不清的闹剧与苦难。

另外荡开一笔去说，特斯拉的这场演示固然令人大开眼界，但如果说制造业硬实力，中国如今占领全球75 %的电动车产量，特斯拉的生产工厂也是坐落于中国上海。特斯拉的能飞车给马斯克带来的是大吹法螺后带来的股价攀升，他自己也承认，这款车并非以安全优化为首要目标的普通量产车型。考虑到汽车制造业包括的电池，电控，车载电子，智能座舱和零部件，继续算上物流，能源和服务业等因素的话，当今的美国甚至无法造出“速成车”。事实上，美国的工人阶级也生活在苦难中，而今天的美国制造业，面对的是长期金融化和资本输出带来的工厂关闭、就业减少和社区经济衰退。

马斯克那边本篇暂且不多提，未来有美国的工人阶级和他们的资本家去算账。而在大洋这边，我们纵然有这么多的电车，无产阶级又有多少买得起？买得起了又有多少买得放心？中国统治阶级要来拿本国电动车行业世界第一的帝国主义成就来诱骗工人阶级熄火，反而更值得中国工人的愤怒：我们工人到底哪里受大益了？！你们做大做强，我们出血出汗出钱闹车祸，我们怎么会是一伙人？若是一伙人，把钱和工厂拿出来都和我们工人阶级分一分！

这世界第一的电动车行业，却连踏板的安全都无法确保。或者说，恰恰是为了其在世界市场上的垄断地位，中国资本家的盈利逻辑才导向了生产过程中的各种隐患。

怎么办？将生产置于工人的民主控制之下，将它内在的运行逻辑由资本主义的逐利驱动变为社会需求驱动，才能让这庞大的生产力真正为了工人阶级的安全和利益服务！

中国与俄乌战争

喀秋莎

自从2022年2月开战以来，俄乌战争已经持续将近4年半。虽尚未结束，但俄方胜利的局面早就明晰。美国挑动起的这场战争，实质是它联合北约、利用乌克兰来力图颠覆普京政权，以削弱俄国的盟友、美国的主要帝国主义对手中国。

北京一直清晰知道华盛顿指向自己的战争动机，所以绝无可能允许美国打败俄罗斯、扶植起亲美政权。一个不战败的普京主导的俄罗斯符合中国的根本利益，也是中国支持莫斯科当前政权的决定性动机。但中国经济也高度需求欧美市场来吸收其出口产品，且世界范围内贸易战不断，所以中国不会毫无顾忌地支持俄罗斯，也需要小心处理自己和欧盟、美国、及世界市场其他部分的关系。

俄乌战争使得中美对抗的世界格局发生了哪些变化，如何影响今日的中国？在中共仔细琢磨的外交辞令和各类实际行动中，它最根本的利益关切是哪些？它的整体战略是什么？俄乌战争给了中国帝国主义哪些经验和启发？工人阶级又如何看待本场战争？本文将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回答这些问题。

1，西方因战争而加速衰落

> “上世纪的两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暴露了全球大国逐渐形成的新关系。在过去四年中，乌克兰战争以及现在的伊朗也发挥了类似的作用。”
>
> ——美国革命共产主义者（RCA），2026美国纵观：即将到来的美国革命

本场战争由仍误以为美帝不减当年的拜登政府开启，并且拉着欧洲的统治阶级建制一并登上了航向打倒普京的战船。但这是一艘贼船，俄罗斯不输反赢。开战后欧洲失去俄罗斯的廉价能源，导致其本就被中国赶超的制造业竞争力更弱，且加深了反被中国倾销的趋势。欧洲核心德国的工业受打击最为显著，现在其面临着每个月失去一万个工业工作岗位，经济成长仅剩0.3 %，但同时陷入越来越大的债务危机。同时其一切建制政党也面临着右翼民粹主义“德国选择党”的强势威胁。德国的危机也是整个欧洲资本主义危机的缩影。

面对美国无可否认的式微，第二届特朗普政府于是更新战略，企图将美国的‘盟友’变成附庸国。美国在格陵兰岛问题上对丹麦的霸凌是力证之一。对盟友的霸凌首先从欧洲开始，让他们承担更多军事开支、债务和失业的痛苦，来承担其往日被美国主导的自身防卫任务。

另外，美国也将关税作为武器，以此胁迫世界市场屈服。早在2025年4月，特朗普就不分盟友与否地对美国所有贸易伙伴实施普遍关税，这使得各国纷纷建立新的贸易联盟追求多元化以避险。对比美国作为贸易伙伴的不稳定，中国基于本国强大的制造业体系，“尊重合同”的北京于是赢得着同世界各大经济体的各大更多来往，将美国的关税转化为自身的优势。

同时，特朗普上台也承诺将美国从“永久战争”的深渊中拖出来，不再让美国插手全球事务，充当“世界警察”。而结束乌克兰战争以及美国在其中的持续军事和经济消耗，也是他为选民开的一张支票。

可是，美帝要是放弃支持乌克兰，若是乌克兰战败，就意味着欧洲要接受俄罗斯的崛起和后者对欧洲各国势力范围的侵蚀，这对他们——尤其是德国——是难以接受的。于是，尽管美国已经降低对乌支援，欧洲仍选择继续为乌克兰输血——并透过举债和紧缩政策加强军备。欧洲工人阶级因此对传统建制更加愤怒，转向暂时投票给各国反建制左翼改良主义和右翼民粹政党。例如最近右翼民粹性质的德国选择党（AfD）最近刚在梅前州成为第一大党，左翼改良主义左翼党赢下柏林。前者的一个清楚吸引支持的主张就是反对德国继续为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援，而后者的全国党纲也包括反对军火输出和北约扩张，有别于德国的建制派各党。

欧洲资本主义被俄乌战争深深打击，陷入了存亡危机。其内部离心力不断加强，各国的自我利益优先于欧盟共同政策的趋势自然愈发被加强。东欧和中欧的多个国家也正被美国或俄国的吸引力分别拉扯。而中国则利用这一情况点对点处理。为规避欧盟对华加强的种种贸易限制，中国开始收购欧洲汽车品牌，在西班牙、波兰、法国等建厂。

但如革命共产国际的分析所言，必须明确的是，哪怕最靠近中国的西班牙“同美国的贸易和金融关系仍然远比它同中国的关系重要。但西班牙正试图通过同中国建立关系、招徕中国投资，来为自己捞点好处。”这对其他欧洲国家也是一样的道理，这即是我们所说的中帝争夺美帝势力真空的指标性极限。

但无论如何，俄乌战争正在加速着西方帝国主义各国的衰弱和中俄的崛起。美国与欧洲盟友关系的变化，也为中国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趁虚而入，尽管目前这空间相当有限。

2，世界警察捉襟见肘

俄乌战争持续期间，特朗普在伊朗鲁莽开启第二场“永久战争”，进一步加速了世界警察的分身乏术和全球经济的不稳定，为中国借助市场和其他方式渗透进美国权力真空提供便利。本就被俄乌战争消耗极大的美国军事资源在新战争中更加捉襟见肘，因此必须调用美军在别处的布置。

伊朗战争开打期间，除却调用在欧洲的战斗机，美国同时期前后又将部署在印太保护日、韩、台湾和东南亚盟友的“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战斗群改派到中东。又在3月将驻韩美军的萨德系统调往中东，而之前美国为了使韩国安装萨德一度使中韩关系降至冰点。此外，美国也在着重将其反导系统储备投入在中东，而这却又使得乌克兰更加难以招架俄国的袭击。目前，受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因军力不足特朗普拒绝了盟友沙特的军事支援请求，这使得沙特倒向同土耳其及巴基斯坦建立共同防御——巴基斯坦无疑是中国的核心盟友。同时，中国自然应沙特请求，也在私下促进伊朗遏制胡塞武装。美国的衰落加速松散着它和其“保护对象”的关系。

3，中国需要世界市场

大哥靠不住，小弟就要自谋生路，根本上不能断了自己财路。中国虽绝无能力也无意愿提供同等级的军事保护承诺，但谁又不和中国做生意呢？各国贸易多元化的策略进一步被加强，美国的盟友也必然如是。韩国上台务实的李在明积极维护发展对中贸易。中东资本也在加速流向香港。东南亚国家向来指望美国提供安全保护，但现实使得东盟在大国博弈间保持克制，在俄乌战争期间就避免选边站，且继续同中国的贸易往来。中国刚好将产业链出口到东盟以绕过高关税出口到欧美，而东盟已连续6年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反之中国连续17年是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

而美国的后花园拉丁美洲同中国的贸易来往，最能暴露中国的经济渗透力。尽管特朗普积极推动拉美减少对中国供应链、投资、关键矿产和基础设施如港口、通信的依赖，并加强拉美同美国的安全和政治合作，但美国无法在经贸关系上替代中国的地位。截止到今年8月，拉美同中国商品贸易持续增长，到达5000多亿美元，中国成为南美最大贸易伙伴。其中高度亲美、右翼政府执政的阿根廷、智利、哥斯达黎加、玻利维亚、洪都拉斯、秘鲁、哥伦比亚对华贸易也在一直扩大。特朗普上台加征关税的一年内，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依旧增长了3.8 %。

中国凭借自身贸易优势削弱美国的背后，是自身严重生产过剩导致其必须不断扩大对世界市场、原材料和廉价劳动力的获取。

被高度剥削且被地产债务透支的中国工人阶级消化生产过剩的能力早已达到极限，中国内需严重萎缩，必须更加依赖出口维持经济增长来稳定内部经济和延迟阶级斗争。就世界经济体量而言，美国占25.9 %，欧洲17.6 %，中国16.9 %，合占近60 %。失去欧美市场意味着中国经济无以为继。剩余的40 %世界市场无力消化中国制造业的高端部分。对世界市场的依赖才是中国一直积极维护全球贸易秩序、表现为“负责任稳定大国”的根本原因。尤其是在对美贸易降低、世界贸易冲突始终不断的背景下，欧洲市场愈发关键。这决定着中国于俄乌战争期间在外交辞令上——尤其是同欧洲援乌体系的轴心德法——始终力求不恶化欧中贸易关系。

4，俄罗斯作为盟友的扩大重要性

不过，即使美国正在衰落，其同盟友关系减弱，这也依旧是受其主导的世界。中国帝国主义在其崛起的过程中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它的对手的盟友阵营仍旧比它更强大。

在中国的周围，美国亚太的强力盟友就包括日本、澳大利亚等重要地区国家，以及历来受到华盛顿大力支持的台湾。

单纯从地缘政治上讲，中国已经在南海和太平洋被美国盟友环绕，自己漫长的北部边境线上有盟友必然好过有敌人。但美国发动俄乌战争正是要逆转北边的情况。击败普京，扶植亲美政权，或将俄罗斯肢解，然后在中国北部的边境周围部署上数个美国的军事基地，使中美对抗中中国愈发孤立脆弱，这就是拜登所想要的战争结果。所以对于中国来说，俄罗斯不能输，它必须全力确保这一点。

俄罗斯确实没有输，且把欧美拖入战争的泥潭，增大他们债务，消耗他们的军事资源和国际声望，使他们的国内政治加速失稳，对比之下总体利好中国。对抗西方阵营是中俄的合作基础，乌克兰战争对俄国还暂时起到稳定政权的作用。因此，战争越推进，俄罗斯和中国越紧密。俄乌战争的持续对中俄的统治阶级目前并不是坏事。伊朗战争是不同的是，后者对世界经济的损害太大，使得中国十分想要伊朗战争结束，贸易恢复正常。

俄罗斯的崛起也为中国提供了诸多的便利。例如前者巩固了自己作为北极的最强军事存在，美国情报体系的2026年度威胁评估中直接写道：

> “俄罗斯是我们在北极的主要挑战……作为非**北**极国家，中国在该地区开展的活动较为有限，主要通过与俄罗斯的关系来推进其战略和经济利益。”

在世界自由航行不再被保证的局势下，俄罗斯给中国提供了探索使用北极航道代替受马六甲海峡潜在威胁的南海和对欧贸易航道的机会。而在非洲，俄罗斯在当地的军事投射能力加强，中国也可以从中受益，暂时互补性地增大自己的经济投射。

同时，俄国能源始终是中国能源安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且随着伊朗战争持续，俄国能源之于中国的战略意义就进一步被加强——尽管中国始终努力在各个领域包括能源防止自己受别国哪怕是盟友俄国的制约。

简而言之：俄乌战争的胜败所造成的一切变化，都使得莫斯科之于北京的重要性自然比战争前更重要。

5，战争如何启发中帝

克劳塞维茨曾阐明，战争是政治的延申。列宁又说：“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 。”而俄乌战争在不只是军事，而是政治和经济层面上都给予中国相当多可用的教训和启发。解放军西部战区上将司令员汪海江总结道：

> “乌克兰危机爆发后，初步展现出‘混合战争’新形态，军事战与政治战、金融战、科技战、网络战、认知战相互交织，推动战争对抗从传统向非传统领域延伸，集中表现为冲突各方综合国力、战争潜力与军事实力的全面较量。”

俄罗斯的胜利经验首先在于其经济方面的成功承压。事实上，战争起初，对俄罗斯政权最大的威胁是西方阵营的疯狂制裁。

根据荷兰克林根达尔国际关系研究所名为《中国从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中学到了什么？》的报告，对俄制裁指向其金融业、关键技术、能源和国防，包括冻结俄央行3000亿欧元储备金，将俄罗斯排除在全球支付体系Swift之外，提高其国际结算的成本和难

度，对军民两用物项输入俄国进行管制，和通过一系列措施减少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出口收入。

战争开打后，俄罗斯经济立刻面对卢布崩盘的金融风险。但通过行政命令强制出口企业（特别是天然气和石油巨头）将其获得的80%外汇收入在市场上卖出换成卢布，并几天内拔高利率至20%迅速止血，莫斯科防止住了短期的崩溃。长期上，俄国石油出口从欧洲转向印度、中国、土耳其等市场，且油价因战争而上涨。而俄国政府的军工支出大幅增加起到短期使经济兴奋的作用。

另外早在2000年，俄罗斯就开始增加黄金储备以备未来可能被制裁外汇。2014年克林米亚危机起到加速作用，俄罗斯开始更快地推进贸易和储备多元，加速去美元化，增强金融自主性。2013年底到2021年底，美元在俄罗斯国际储备中的占比几乎下降了四分之三；黄金占比从8.3%升至21.5%，人民币则从0升至17%。经年的多元化准备使俄国哪怕一半储备被立刻冻结，它也能赢得足够使经济转向的时间和渠道。

俄罗斯的成功先例显示了提早准备的重要性，而持续与美国打贸易战的中国也学到这点，尤其是面对类似经济制裁的可能。这也解释了中共一直致力于增强自己的全方位摆脱自身对西方经济的依赖，例如上文我们提及的能源领域，以及食品和金融领域。

此外，中国帝国主义本身的崛起和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中不可或缺的地位也让反制任何的西方制裁变的更加有力。外汇储备多元化，人民币国际支付力增强，利用和加强中国于全球供应链的核心位置并将其转化为一种威慑手段，且推出相关法律如《出口管制法》来控制稀土等，都是中国可以反制制裁的底牌措施。

中共学到的第二课，就是俄罗斯前线对抗的胜利经验。战争说到底消耗的是武器和人员，决定武器生产供应的军工制造业能力因而是持久战的关键。这里正是中俄所长，欧美所短。若是转为长期战争，这就决定了俄罗斯前线的胜利。《沃德舆情观察》的作者陈建民正确地结论道：延长冲突可以削弱美国的技术优势，使胜负最终取决于国防工业的基础能力。这进一步推动中国来依托于自己强大制造业的军工自主的长期战略。

俄罗斯在前线早期经历了从挫败到推进的变化，这种军事逆转也启发了中共。战争早期，莫斯科错误将2014年入侵克里米亚的经验应用于全面战争，认为可以透过速胜战击溃乌克兰政权来瓦解其军事能力，于是在前线推进上兵力不足、后勤脆弱、协调不够因而造成失利。

美国智库兰德公司的《中国从俄乌战争中学到的教训》报告指出，这使得解放军认识到，不应指望仅凭最低限度的军事介入，就能在国家间的政治竞争中取得胜利。这使得习近平在23年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公开指示“要坚持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作者注：极限即同美国的军事战争)，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这反映了中国军国主义在帝国竞争中的必然加强。

另外，俄乌战争反映了今日现代战争进一步要求能够跨军种调用力量的联合指挥体系的事实，此外也更加强调无人机和信息化作战。 这使得中国进一步注重其正在推进的、对其前一个时代陆军独大的体系的革新，习近平因此必须毫不留情地移出张又侠等旧陆军将领，设立新部队，推动新技术（如星网工程）和以多元指挥体系替代旧的军政体系。

俄乌战争也使得中国意识到现代战争开打容易结束困难，非常难以控制其时间、范围和成本，因此要避免卷入不必要冲突。这也会令中国对贸然入侵台湾持更谨慎的态度，且为若是开打后中共能打长期战争且能赢的可能性做高度军事准备。另外，俄乌战争使得中国可以估量武统台湾这一方案的代价、方案和欧美到底能支援台湾多少。中国目前主要意在基于经济关系透过国民党亲中派来慢慢推进对台湾的主导，有武统准备，无武统日程。就如美国情报体系的同一份年度威胁评估文件所言：

> “北京可能仍会寻求在避免冲突的情况下为最终与台湾统一创造条件。尽管中国威胁称，如有必要，将动用武力强制统一，并反制其认为美国企图利用台湾削弱中国崛起的行为，但中国更倾向于尽可能以非武力方式实现统一。中国人民解放军也在持续发展军事计划和能力，以便在接到命令时动用武力实现统一。”

最后，俄乌战争的舆论战之激烈，长期甚至误导西方群众以为乌克兰占上风，而现在西方群众正在逐渐看穿这些谎言，并失去对自己统治阶级的信任。这启发了中国进一步利用美国声誉的降低，符合自身经济利益地塑造自身为“负责任”的大国，改进其在全球群众之间的形象。这实际上正在奏效，皮尤研究中心今年7月发表的研究显示，在36个受访者国家中，对中国的好感首度超越美国，包括美国的近邻加拿大和墨西哥，以及多数欧洲、拉美和亚洲国家。不过这一点也会反过来影响中共的考量，并可能会使得其更倾向于维持当前国际社会中的威信和地位，而不是让贸然发起军事冲突破坏这一成果。

6，中共的心路历程

拿破仑曾说，战争是所有方程式中最为复杂的。面对俄乌战争这一巨大的国际事件，北京对它的认知和对策也是随着战况的推进不断调整——虽然其根本原则始终是要世界贸易和俄罗斯胜利二者兼得。

2022年2月24日俄国的全面进攻乌克兰后，中国无法确定俄国必胜，因而也担忧自己作为盟友遭受制裁。中国在早期一直呼吁双方谈判，但也始终谴责欧美对俄制裁为非法单边行为。中共官方质疑西方媒体“入侵”一词的公正性，为俄罗斯对抗西方舆论造势，并强调美国为局势紧张的根源，表示理解俄罗斯的安全关切。但为了欧美市场，中国外交部也依旧照例强调尊重乌克兰的主权领土完整。时至今日，中共虽未谴责乌东四省并入俄国的公投，但也尚未承认其结果。

但实际上，中国资本对市场风险的敏感比中共的政策更先来。开打第二日，未受上级指示下，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考虑到美元结算体系、潜在二级制裁风险和维持本身的国际业务，就开始限制向俄国商品融资。部分中国独立炼油厂也因担心交易承受制裁风险而暂停放缓购买俄罗斯海运原油。到了3月，担心规避制裁和俄罗斯市场，中国品牌华为、小米和OPPO对俄手机供应减少近一半。4月大疆科技暂停同俄乌的所有业务，主动证明自己的产品未为军事用途服务而避免被制裁。

胜负并不明朗的战争初期，中国继续维持中俄贸易往来时，也一直在非常小心评估其所带来的自身被二级制裁的风险。3月对俄商品出口和从俄的能源进口都下降明显。中国在早期也接连否认对俄提供物质支持。中国银联担忧二级制裁风险，因而于4月拒绝和俄罗斯受制裁银行合作。

但4月之后，前线调整策略，转入对俄方更有优势的消耗战。5月中国多个省份的地方官员表示有兴趣促进对俄贸易。中俄在能源、军事和太空上战略合作加深，直接使用双方本币结算。同俄国的石油贸易贸易不断扩大，6月中国代替德国成为俄罗斯石油最大购买国。5月24日，中俄更进行了联合军演。中国实际对俄支持一直持续：2022年前五个月内，为填补俄国军工需求空缺，中国对俄的微芯片等材料的出口增加，这些产品多具有军事用途。美国因乌克兰问题对中国公司的制裁也在6月开始。

而在8月到11月，俄军丢失大片占领区时，9月的上合峰会上，习近平就对普京表达了就乌克兰的“疑问和担忧”。普京客观地将中国的立场评价为“平衡”，意思是中国既支持俄罗斯，也力图保护中国的贸易。中国尽管有担忧，10月王毅仍旧表示：“中国将坚定支持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领导的政府。”

此后，中国继续向俄罗斯出口军用零件、卫星图像、芯片、防弹衣、无人机等可支援战争的产品。对俄贸易也不断扩大。到了23年底24年初，俄军占据主动，且贸易战争中国利用稀土这张底牌开始更大力反击美国，其对俄罗斯的支持也更有底气。而美国对中国的制裁也在24年下半年加剧。年末欧美也开始对中国实体制裁，随后特朗普的就任更开启了对华的全面贸易战。

然而，这一切都没有弱化中国或是逼迫它降低对俄的暗中支援。根据彭博社2026年4月的报道，俄罗斯超过90%用于制造武器的受制裁技术都来自中国。毕竟，面对美国这个共同敌人，俄罗斯在乌克兰和中国在贸易战上都频频取胜，互相支援的必要也更明显了。

回顾中国在俄乌战争中的反应，我们可以清楚看到：中共凭借着经验主义的思维，在每个节点审视着战争的进展和自身利益之间的关系来决定如何行事。战局和世界格局的变化也让支持俄罗斯成为中国资本主义唯一的利好选项。但是，在资本主义的世界内，如英国前首相帕麦斯顿勋爵所言，“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中俄帝国主义的友谊绝非天长地久、永世不破，只不过目前两者之间的任何嫌隙都次于对抗西方阵营、尤其是对抗美帝的共同利益。

另外，虽然中国在俄乌战争和贸易战双线上都收获利好，但这不代表中共有着克服一切障碍的神机妙算。中国帝国主义的优势基础是本国资本主义经济体的强大，因此，它就必不可能只享受其利好却不承受本国内同等巨大的资本主义矛盾，而后者是中共任何政策都无法彻底克服的。举例来说， 2015年中国提出内外市场双循环战略，但中国严重的生产过剩导致国内市场收缩，双循环战略自然无法如愿。中国帝国主义的一时风光，背后是中国工人阶级在付出血汗，承担风险。

7，工人阶级付出代价

兰德智库的报告指出，解放军研究人员在俄乌战争中曾得出一个非常残忍的结论：通过采取反制措施、压缩战场空间以及保持**更高的伤亡容忍度**可以来克服美国的技术优势。这对应着事实上俄军在战场上惊人的人员伤亡。

当解放军得出这个结论，那么是谁未来的尸体被算在那个更高的伤亡容忍度里？富人和达官自然不用参军，战壕里死的必然绝大多都是普通人，在今日中国就是又被高度剥削又被算在“更高伤亡容忍”里的工人和年轻人。

事实上，正是工人阶级承受了战争的代价。乌克兰工人阶级被欧美帝国主义当作炮灰，鲜血白白地流。俄罗斯的工人阶级虽是为反对西方帝国主义而支持普京，但根本上利好了俄国的资本主义。面对利润，俄国寡头在燃油紧张期优先想到更高的出口收益，而非工人阶级的生活必需，于是导致俄国内部油价上涨。对欧美的工人阶级来说，战争不过是给了各国政府合理化砍福利预算的理由，把他们拖入无止尽的紧缩黑洞。在更脆弱的世界其他地区，战争带来的通胀让当地劳苦大众的生活雪上加霜。

而在这边，中帝之耀武扬威又于中国工人阶级何加焉？根据清华大学的演讲：“在财富维度，当前中国家庭财富基尼系数已超

过0.7，全国最富有10%家庭拥有的社会总财富超过60%，呈现出明显的‘K’字形分化。”而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0年中国基尼系数为0.468。

帝国主义者们的竞争和战争，不过是为了他们各自的统治阶级而战，流的是无产阶级子女的血，花的是无产阶级创造的财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当然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在全球的暴行，但我们也并不捍卫俄国或中国的资产阶级及其政权，更不被中俄帝国主义的合理化战争的说辞所蒙骗。

归根结底，一个社会的命运，应当交给运作它的无产阶级去掌握，而非只顾牟利的资产阶级。面对帝国主义战争，民族主义的立场救不了工人阶级。唯有秉持国际主义阶级立场的社会主义革命，才是解救所有无产阶级于帝国主义战车之下的方法。

真实的鲁迅-历史转折点的革命文豪

帕里斯·蒙克

> “当人们好像只是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闻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i]

在马克思写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时，法国的共和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投机分子都忙于从大革命的伟大历史中召唤他们的亡灵。中国二十世纪的历史—这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剧变—丝毫不缺少可以召唤的亡灵。在这个阶级斗争风起云涌的时代，从历史中召唤出的是哪般亡灵对于今日的革命者来说关系到未来斗争的纲领、策略和面貌。而在官僚为了标榜自己继承“革命”传统所散布的种种迷雾中，找到二十世纪中国从文化到政治社会巨变的真正面貌就成为了马克思主义者义不容辞的任务。

而鲜有人物像鲁迅在当代中国有如此矛盾的形象—一方面，他是官僚们都想勾肩搭背的“知己”，习近平便非常喜欢吹嘘：“我在‘文革’期间，把当时出版的鲁迅文集都看了，有的书看了好几遍”[ii]，并号召大小走狗都跟自己一起“弘扬”鲁迅精神；另一方面，他是令官老爷和资本家们都惴惴不安的幽灵，向往民主与平等的进步青年的鞭策者和导师。他的作品内容反映了中国

二十世纪初期激进、向往革命的社会意识和他个人对传统文化、殖民主义和社会动态的深刻反思，其辛辣、批判的风格更是令生活在资产阶级剥削和中共独裁枷锁中的读者酣畅淋漓。也正因如此，他的文章被悄悄地从课本中删除，当在抗议中中国青年模仿鲁迅在街上呼吁群众“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生”，“在黑暗里发一点光”的时候，警察只能遮遮掩掩的把他们赶走[iii]。中共官僚虚伪的行为揭示了他们的真面貌：**过去谁革命、怎么革命，现在谁是“革命”的、谁又不能革命，不是按社会物质活动的真理来决定的，而是按少数当权者的便利来决定的**。

革命马克思主义者清楚地认识到：**如果要为未来的中国革命指明方向，就需要破除中共官僚对过去革命的谎言和迷信**。通过对鲁迅本人真实思想，和其所处在、所思考时代的揭示，本文旨在讨论并澄明鲁迅究竟是站在民族主义还是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立场，以及布尔什维克革命党和文艺活动、创作者关系的疑问。

五四运动与“救国”

在鲁迅的葬礼上，中共统一战线下的中国人民救国会在鲁迅的棺椁上盖上了“民族魂”的绸幛[iv]。自此以后，将鲁迅成为一名民族主义者就成为了一件顺理成章、颇为方便的事情。现如今，中共喜欢跟我们强调鲁迅有多“爱国”，多想“救国”，转而告诉我们要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团结起来，抗击西方国家霸权。

这是对鲁迅真正立场的拙劣模仿。

对于那个时代受到帝国主义压迫的中国人来说，**“爱国”与“救国”从来都不是关于民族自强（成为列强）或者民族复兴的事情，尤其不是将中国传统文化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重新请回来的事情**。将中国从帝国主义的枷锁中摆脱，意味着学习世界上最先进的政治和科学理念，将“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带到中国[v]。鲁迅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只不过在他人生的不同阶段，他用不同的方式来实践这件事情。

鲁迅从来都不是一个标榜中国文化和传统的人。年少时，他在江南水师学堂和矿路学堂学习日语和德语，如饥似渴地吸收西方最新的医学和地质学知识。这让他成为了中国最早接受和传播地质学和进化论的人之一，“侏罗纪”和“白垩纪”这些古生物学名词就是首先由他翻译而来[vi]。这种对进化论的认识也成为了他后来对社会演化和革命支持的发端。

仰慕日本同为落后东亚国家维新取得的现代化成果，他赴日留学，在这期间他对其他受压迫民族的文学和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翻译了诸多俄国和东欧弱势民族的文学[vii][viii]。鲁迅对受压迫民族解放的认识从源头就不来自于对中国古老社会和文化的认同，而是来自于在殖民主义下对民族压迫普遍性的觉悟。

这种对政治和文化理解的逐渐加深让他的兴趣逐渐从通过科学救国变成了通过文化和政治救国[ix]。但他并没有选择成为一名政治家和组织者，而是成为一名文人。他的志趣并没有在领导中国茁壮发展的工农和学生运动上，而是在写作上。**他通过笔，而不是武器和旧社会作斗争**。

毫无疑问，鲁迅一直到二十年代早期都以唤醒“国民”的意志作为自己的任务，但他的民族主义从来没有建立在对过去传统的尊崇上，事实上他敏锐地观察到：**“中国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是用很多人的痛苦换来的，无论中国人，外国人，凡是称赞中国文化的，都是以主子自居的一部分**。”[x]作为地主、佃农和官宦社会所反射的意识形态，中国的传统文化无疑是落后和保守的。鲁迅激进地对中国文化进行彻底的否定，从而给远远超出文化范畴的革命性新文化运动腾出空间。他毫不留情地揭露那些幻想把传统文化和激进意识调和的人的虚伪面目：**“他们反对一切舶来的东西，说这会‘用夷变夏’；不过，要是这夷人统治了中国，他们又发现这夷人其实也是黄帝的苗裔**。”[xi]对于鲁迅来说，重要的从来不是中国还是外国的，而是进步还是保守的，压迫还是解放的。

在五四运动以后，鲁迅意识到了资产阶级的买办和军阀跟帝国主义紧紧勾结在一起，不能完成中国的民主革命任务。**为了完成民族解放和民主革命的任务，中国人民必须从阶级合作、民族团结的立场走到阶级斗争的立场，并以此调整政治策略**。

《阿Q正传》这部伟大的作品就体现了这一点，主人公阿Q在经历了革命之后（革命具体的名字被抹去了，正是为了对中国

传统农民革命和辛亥革命的相似性，也就是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进行反思）却观察到：

> “知县大老爷还是原官，不过改称了什么，而且举人老爷也做了什么……带兵的也还是先前的老把总。[xii]”

正是辛亥革命中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导致了民主革命没有被彻底完成，旧有的制度仍然在新的形式下被保存了下来，由此导致民众的意识中也没有发生根本的革命，孙中山的任务并没有完成—革命仍然不是全体国民的，而仍然是少数权贵的利益、权力交接。这既反映在阿Q和他周围的农村群众对辛亥革命朴素的前现代理解中，也反映在旧时代知识分子的投机倒把中：

> “至于革命党，有的说是便在这一夜进了城，个个白盔白甲：穿着崇正皇帝的素。”[xiii]

> 那还是上午的事。赵秀才消息灵，一知道革命党已在夜间进城，便将辫子盘在顶上，一早去拜访那历来也不相能的钱洋鬼子。这是‘咸与维新’的时候了，所以他们便谈得很投机，立刻成了情投意合的同志，也相约去革命。他们想而又想，才想出静修庵里有一块‘皇帝万岁万万岁’的龙牌，是应该赶紧革掉的，于是又立刻同到庵里去革命。因为老尼姑来阻挡，说了三句话，他们便将伊当作满政府，在头上很给了不少的棍子和栗凿。尼姑待他们走后，定了神来检点，龙牌固然已经碎在地上了，而且又不见了观音娘娘座前的一个宣德炉。”[xiv]”

正是资产阶级在意识和经济上的双重无能和妥协导致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破产。此后数十年的民国政府的历史也告诉我们——做列强三流奴才的中国资产阶级和其政治代表无力从帝国主义手中“救国”！

在中国已成为新兴帝国主义势力的今天，鲁迅的立场尤其需要革命共产主义者通过历史环境进行反思。他在彼时支持的民族意识觉醒和爱国救国运动是对帝国主义压迫的进步抗争，并且**他本人也很快反思到了民族主义的局限性**（哪怕是“国际性的”民族主义）。倘若有“左翼”人士在现如今的中国支持中共为无产阶级画的民族复兴、民族团结的大饼，帮助游说无产阶级现在苦一苦，等中国成为世界头号帝国主义国家了就可以享受工人贵族的生活，那就跟鲁迅**“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xv]的反帝革命精神背道而驰了。同样，倘若中国群众发动了推翻中共党国的斗争，如果仅仅支持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那么也就**只是让官僚和他们的资产阶级走狗们“将辫子盘在顶上”**，改个名号继续统治罢了！

批评自由与“党的文学”

自从鲁迅死后，毛泽东便把他的名号当成了自己手中的大棒。在鲁迅逝世一周年的讲话上，毛泽东将他吹捧为“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党外的布尔什维克”[xvi]。这便有两重作用：一方面鲁迅成了毛泽东的亲密同志、精神知己；另一方面，凡是党的政策（毛的政策），也就成了鲁迅的政策。我们会看到这种利用的滑稽表现：在50年代鲁迅是需要接受改造，“要被整整的”臭老九[xvii]，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鲁迅又成了毛主席忠诚的红卫兵，“一定会站在文化革命战线的前头行列，冲锋陷阵。”[xviii]在这对鲁迅的滑稽骑劫中，**他仿佛成了一个无原则听命于党的御用文人**，这是鲁迅的真实立场吗？

一、党的“文学”问题

毛泽东在1942年所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可以说是中共毛泽东时代对文艺态度最经典的论述，也因此今日的“马列毛主义者”也将此文视为“走无产阶级路线”的文艺政策。在此文中，毛泽东声称列宁认为**“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因此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毛泽东进一步引申，鲁迅便是这样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文艺工作者在整风运动中就要以鲁迅为榜样，“能够改造自己和自己作品的面貌”[xix]。

文艺工作者需要按照革命党的任务改变自己作品的面貌吗？既然毛泽东和“马列毛主义者”都自认为是列宁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精神继承者，我们就需要考察一下毛泽东所提及的列宁的文章（Партийная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и партий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请读者原谅我在这里使用了俄文原文，因为我们正要谈到的就是一个涉及俄文翻译的重要问题 - 这篇文章被翻译为多个版本，而最大的分歧就在于литература一词究竟是翻译为文学还是出版物。[xx]（中共最新版的《列宁全集》也已经翻译为了“出版物”）

为了释义上的严谨，我们需要联系列宁原文中的上下文对列宁的原意进行推断。在本文的开头，列宁提出：

> “十月革命【指的是1905年10月30日沙皇签署给予公民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的《十月诏书》】以后在俄国造成的社会民主党工作的新条件，使党的出版物【或文学，литература】问题提到日程上来了。非法报刊和合法报刊的区别，这个农奴制专制俄国时代的可悲的遗迹，正在开始消失。我们首席大臣的伪善的政府还在胡作非为，以致《工人代表苏维埃消息报》还在‘非法地’出版”。[xxi]”

由此可见，当列宁说党的出版物需要是党的“齿轮和螺丝钉”的时候，他谈的并不是对文学进行审查，将其作为党政纲领的延申，而是**先锋党的党报党刊在民主集中制下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服务**（这也与列宁在《怎么办？》中对党报的论述相吻合）。当然有作家会向往革命、支持革命，甚至参与革命，**但他们的文艺作品不是党报——党的组织和政治宣传工具**。党报当然需要遵从党在特定时期所确立的政治路线，但对文艺作品进行审查，尤其是禁止那些对党和党的政治路线进行批评，或对当前社会进行反映和批判的文艺作品，毫无疑问会扼杀文学创作的活力。鲁迅从来没有同意过这样的观点。

二、鲁迅的文艺观

在1927年《革命时代的文学》演讲稿中，鲁迅提到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

> “但在这革命地方的文学家，恐怕总喜欢说文学和革命是大有关系的，例如可以用这来宣传，鼓吹，煽动，促进革命和完成革命。不过我想，这样的文章是无力的，因为好的文艺作品，向来多是不受别人命令，不顾利害，自然而然地从心中流露的东西；如果先挂起一个题目，做起文章来，那又何异于八股，在文学中并无价值，更说不到能否感动人了。”[xxii]”

鲁迅一生都坚持这样的观点—文学是从来不能政治挂帅的，得是**“自然而然地从心中流露的东西”**。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学就没有政治性、阶级性，但它并不是完全受政治经济支配的，而是有自己一定独立发展的逻辑。一些机械唯物论者并不理解这一点，事实上，当时鲁迅就针对主观唯心主义和机械唯物论的文学观做出了

评价。当林癸未夫（日本文学批评家）用无产者和有产者都要吃饭睡觉来反驳唯物史观提出的阶级分析时，鲁迅答道：

> “来信的‘吃饭睡觉’的比喻，虽然不过是讲笑话，但脱罗兹基【托洛茨基】曾以对于‘死之恐怖’为古今人所共同，来说明文学中有不带阶级性的分子，那方法其实是差不多的。在我自己，是以为若据性格感情等，都受‘支配于经济’（也可以说根据于经济组织或依存于经济组织）之说，则这些就一定都带着阶级性。但是‘都带’，而非‘只有’。”[xxiii]”

上文中鲁迅就已提到了托洛茨基。的确，他本人早年就阅读了托洛茨基的文艺理论《文学与革命》，并在多篇文章中提及。[xxiv]鲁迅远远说不上是一名托洛茨基主义者（列宁-布尔什维克主义者），毕竟这个词包含了诸多政治涵义，而鲁迅对这些政治问题并不完全清楚，也更没有研究过托洛茨基的政治经济作品。但他在文艺工作中所遇到的问题，和他对文艺问题的态度却和托洛茨基颇有相似之处。

在文艺工作中，托洛茨基和鲁迅分别作为政治家和作家遇到了阶级还原论的对手。在苏联，托洛茨基的主要论敌是波格丹诺夫的“无产阶级文化论”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文化协会。该协会激烈地否定非无产阶级艺术家的创作，并且鼓吹通过一小撮无产阶级出身的作家孤立地成立一个工作室来从头培养纯粹的“无产阶级文学”[xxv]；在中国，鲁迅遭遇到了以创造社和太阳社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文学派，和俄国的无产文协一样，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学派从唯心主义的观点出发，主张有良好鼓动效果，为革命服务的才是好文学。[xxvi]1928年，鲁迅、茅盾两位作家和无产阶级文学派之间爆发了激烈的争论。鲁迅的回答从一名作者的角度出发，指明艺术创作中作家自由发挥的重要性。托洛茨基的回答则是从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角度出发：

> “自己的路艺术应当用自己的腿来走。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并不是艺术的方法。党领导着无产阶级，却不领导历史的进程。……艺术的领域，不是党应当去指挥的领域。”[xxvii]”

尽管艺术趣味相比托洛茨基更偏古典，但列宁同样不把自己的艺术观念强加在艺术家身上，并极力反对试图把文艺路线变成党的路线的波格丹诺夫。

> “对那些过多地、过于轻率地侈谈什么‘无产阶级’文化的人，我们就不禁要抱这种态度，因为在开始的时候，我们能够有真正的资产阶级文化就够了，在开始的时候，我们能够抛掉资产阶级制度以前的糟糕之极的文化，即官僚或农奴制等等的文化也就不错了。在文化问题上，急躁冒进是最有害的。我们许多年轻的著作家和共产党员应该牢牢记住这一点。”[xxviii]”

这种文艺创作自由的观念贯穿了鲁迅一生。尽管没有经过精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鲁迅的文学观可以说是接近历史唯物主义的，他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区分开来，同时也意识到了文化和经济的相互作用。正是这种文学相对于政治的独立性使好的文学不可能是一个完全由阶级政治支配的东西，因此它也需要一定自我有机发展的空间，掐掉这个空间，就会让文学成为死气沉沉的八股文。**比起毛泽东和斯大林对文艺事业的严格审查，鲁迅的立场明显更接近托洛茨基和列宁**。

三、陷于政治漩涡中的文人——同志、信和迫害

鲁迅作为一名文人，既没有加入共产党，也没有仔细研究过马克思主义著作，自然谈不上政治家或理论家。但他的文艺知己瞿秋白确是中共的中央委员会宣传部长和政治局常务委员，后来也担任了总书记。瞿秋白本人早年也阅读过《文学与革命》，并在访苏期间写下了《赤都心史》，其中对托洛茨基颇有仰慕。[xxix]他的这种态度在斯大林对左翼反对派的清洗中自然是造成了悲剧性的后果。在1928年共产国际第6次代表大会上，瞿秋白仅因为说了托洛茨基的中国革命论“有些意见还值得考虑”，就被王明等人扣上了“半个托洛茨基主义者”的名号。[xxx]此后他在中共不断被边缘化，1935年在临死前他在狱中写下：“*廿载浮沉万事空，年华似水水流东，枉抛心力作英雄。*”斯大林主义者对党内民主的打压和肮脏的政治手段尽让一名革命志士到了如此消沉绝望的地步，呜呼哀哉！

在这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堕落成官僚集权机构的过程中，就连党外的鲁迅也不能幸免。**毋宁说，鲁迅的正义感和他民族救亡的决心被中共的官僚们绑架了**。在这其中最臭名昭著的事件就是被冠名到鲁迅身上的《答托洛茨基派的信》。目前学界已有共识，该信绝非鲁迅作品，但这封信在中共历史上的地位甚高，甚至被视为反托洛茨基的大旗，因此中共在再版的《鲁迅全集》中从未删除此信。

中共（在斯大林所掌控的共产国际指导下）与国民党第二次形成人民阵线后（即抗日统一战线），鲁迅表达了对这个举措的惊愕和不解。在《半夏小集》中，鲁迅讽刺道：“**‘联合阵线’之说一出，先前投敌的一批‘革命作家’，就以‘联合’的先觉者自居，渐渐出现了**。”[xxxi]这种观点自然是跟鼓吹“国防文学”（即文学中的人民阵线）的中共相左的，以至于当时出现了鲁迅是“托洛茨基者”的传言[xxxii]。我们在这里再次强调，鲁迅不是一名政治家，**因对时局发表见解称呼某某作家为“托洛茨基主义者”或“斯大林主义者”都是一种政治抹黑**。[xxxiii]

在这种情势下，一位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向鲁迅写了一封信希望能够让鲁迅知晓托派的政治意见。据当时该事件的亲历者，中共党员、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员胡风回忆，收到信件后，时任中共中央特派员的冯雪峰在鲁迅病重时代笔完成了此信，并仅仅在鲁迅病榻前念了一遍这封信后就代其发表。冯雪峰还向胡风抱怨：“**鲁迅还是不行，不如高尔基；高尔基那些政论，都是党派给他的秘书写的，他只是签一个名**。”[xxxiv]可见这封信极难被称为鲁迅的观点。

这封信的内容又是什么呢？在信中，“鲁迅”先是嘲讽了托洛茨基“**被逐，飘泊，潦倒，以致’不得不’用敌人金钱的晚景[指托洛茨基在墨西哥政治避难]**”，接着暗指托洛茨基派“**拿日本人钱来出报攻击毛泽东先生们的一致抗日论**”[xxxv]。此等言论恰是鲁迅本人最痛恨的，在批判梁实秋的文章《“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中，鲁迅言道：

> “指示着凡主张‘文学有阶级性’，得罪了梁先生的人，都是在做‘拥护苏联’，或‘去领卢布’的勾当……自由大同盟上有我的名字，《革命日报》的通信上便说为‘金光灿烂的卢布所收买’”……比起‘佥子手’来，也就更加下贱了。”[xxxvi]”

这番比枪杀革命志士的佥子手更下贱的言论，怎么又会被鲁迅本人重新用来攻击托洛茨基主义者呢？**把这封信的内容挂到鲁迅的名下，是对他的一种恶毒的侮辱**。

作为一名将自己的一生献给正义和解放的文人，鲁迅并没有过多的涉足政治，除了笔杆子外，他也没拿起过其他的武器。因此他并不了解千里外苏联政治中的诸多纠葛，和由此在中国的左翼政治中所造成的灾难性影响。在他的党中好友要么变成斯大林的忠实走狗、要么被清洗的时候，鲁迅在彷徨中并没有太多的选择。**这种无奈是在时代的漩涡中一个有风骨的文人孤单的挣扎**。

结语

为什么鲁迅在二十世纪早期的文坛独树一帜？他的赤诚、他的才华和他对社会敏锐的观察使他的杂文讽刺和故事描绘入骨三分。但更重要的是他的执拗和傲骨——不对强权低头，永远都说从心中自然流出的话。它启发着革命共产主义者，因为反抗绝望的现存秩序、通过专业革命工作彻底地改变社会同样需要一种决绝的勇气。这种勇气是所有“现实主义者”、愤世嫉俗者的“不可能”领会不到的，毕竟**“绝不能以我之必无地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xxxvii]。

纵观鲁迅的一生，他为社会中受压迫和剥削的弱势者而呐喊，在对国民革命的反思中从民族主义立场走向阶级立场。但他从来不能被归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亦或“毛派”、“托派”。无论是何立场，自认为是革命共产主义者的人都应认识到马克思主义者是一名投身组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人。但这并不妨碍革命者从鲁迅这位同路人的文学作品中汲取灵感和鼓舞。正如文章开头所说的那样，重要的是启发我们的究竟是怎样的鲁迅？**扒开了中共官僚集团为了粉饰自己的特权，和保留其特权所使用的集权手段所抛出的迷雾，我们才能从历史中还原鲁迅思想和他所处时代的真正面貌，为这一代的革命者澄清社会主义革命的方向**。

【本篇的注释请参见我们网站原文】

转载：欧洲的红色之秋

Ben Curry

上周末运动达到高潮时，法国群众与警察一路搏斗，一直打到离爱丽舍宫台阶仅300米的地方。总统办公室里的紧张气氛是可想而知的。全国有一百万、甚至可能两百万人动员起来。统治阶级已被撼动至根基。（按：本文原文发表于2026年10月22日。）

利摩日市政厅燃烧的画面被无休止地循环播放，舆论对着那烧焦的砖墙和破碎的玻璃哀叹不已。与此同时，他们闭口不言的是，当天早上，警察向和平集会的抗议人群发射催泪弹，一手制造了这样的结果，或是过去几周里，全副武装的警察把十几岁孩子的下巴、牙齿、眼睛和双手打得稀烂。

有人企图煽动一场文化战争，把这一切归咎于穆斯林和所谓的“新来者”。哦不，这和“新来者”毫无关系。这是土生土长的，一辈子被侮辱、贬低的现代无套裤汉的怒火。

巴黎街头新出现的涂鸦，借历任总统那些臭名昭著的话，道出了几十年来积压的情绪：“希拉克说我们是‘噪音和臭味’；萨科齐说要用‘高压水枪’把我们清洗干净；奥朗德叫我们‘没牙的人’；马克龙叫我们‘无名小卒’——让他们的蔑视见鬼去吧！”

运动的规模让统治阶级完全措手不及。1000名防暴警察受伤。内政部长洛朗·努涅斯承认：“我们已经失控了。”在一些地方，警察精疲力竭地摘下头盔，等于认输。但这仅仅是开始。

Z世代革命来到欧洲

我们曾预言，Z世代革命会比人们预料的更早来到欧洲。如今它们来了。法国站在最前列，不愧于自己的革命传统。能与之匹敌的或许只有阿尔巴尼亚：在首都地拉那，大批青年与警察的街头混战已持续多日。

但整个欧洲都在燃烧，许多国家只落后一两步。

在西班牙国家境内，大规模抗议一周接一周地席卷全国。正如法国国家殴打孩子，在西班牙，当局出动了好几车防暴警察和一架警用直升机，驱逐并害死了87岁的退休老人玛丽卡门（Maricarmen），只因为她侵犯了一家秃鹫基金的产权——这家基金如今拥有她住了70年的房子。

这就是欧洲为之武装到牙齿、为之向乌克兰的血腥屠场源源不断输送武器的自由主义、“民主”的西方价值观。

在西班牙，总罢工已定于11月11日举行。在法国，工会在百般犹豫之后，号召把11月5日作为行动日。本月晚些时候，码头工人将于10月30日举行反军国主义罢工。全欧洲青年反军国主义罢课已定于11月20日举行。在意大利，总工会CGIL领导层号召于11月20日举行总罢工。

这将是一个非常火热的秋天，颇有1968年的味道。在法国、西班牙、葡萄牙、比利时、希腊、意大利、爱尔兰、塞尔维亚、阿尔巴尼亚等地，运动已经爆发。其他各地也遍布同样的易燃物。

这些运动各有不同的导火索，但诸多因素正汇成一股洪流：生活成本、房价、军国主义、巴勒斯坦、环境、紧缩、住房、教育、种族主义、对右翼和法西斯主义的仇恨。人们对警察暴力义愤填膺；警察暴力非但没能镇压住运动，反而撕碎了不问政治的阶层对“民主”国家抱有的幻想。

欧洲尖锐地体现了这个制度的一切矛盾。我们推荐读者阅读这篇文章。作为资本主义的诞生地，欧洲或许是这个制度在老朽衰败的道路上走得最远的地方，是资产阶级寄生性最强的地方，也是民族国家的局限最令生产力窒息的地方。乌克兰的战败是把这片大陆推下悬崖的最后一把力。

但欧洲只是尖锐地表现了一个在各地肆虐的进程。这些运动是一连串革命事件的组成部分，从斯里兰卡一路延伸到孟加拉国、肯尼亚、印度尼西亚、尼泊尔、马达加斯加。

眼下，始于南亚的革命事件已经波及印度。在那里，诉诸镇压的莫迪政权变得越来越脆弱，开始走上孟加拉国哈西娜政权的老路。

在巴西，数以百万计的青年正动员起来反对极右翼。智利、阿根廷眼下都有大规模运动在进行；在哥伦比亚，极右翼政府上台才几周，就迎来了一场总罢工。

我们看到全球各地都有革命事件爆发，它们是同一种疾病的诸多症状：资本主义的垂死挣扎。

巨大的飞跃

随着年轻人再次占领西班牙马德里的太阳门广场和希腊雅典的宪法广场，2011年运动的回声隐约可闻。我还记得，2011年1月25日“愤怒日”那天，我在电视上看着埃及群众在开罗解放广场上英勇地与穆巴拉克政权的打手搏斗。运动迅速蔓延到欧洲，掀起了反紧缩的大规模罢工和广场占领浪潮，接着又在美国流行开来，出现了“占领华尔街”运动。

当前的运动与那时有几分相似，但在质上高出了整整一个层次。意识发生了巨大的飞跃。

2011年时，人们的情绪不仅不问政治，而且是反政治的、混乱的。这很自然。在大多数地方，那是几十年来的第一次群众动员（除反伊拉克战争抗议外）。

当时人们常说，这无关“左与右”，而是“上层与下层”之争。在西班牙为这种情绪提供政治表达的“我们能”党

（Podemos）说，我们“人民”（la gente，而非工人阶级）在与“特权阶层”（la casta）作斗争——不管那指的是谁。

人们不仅怀疑政党，而且怀疑一切领导。我还记得，2011年我的大学被占领，那次占领规模相当大。我带了几个年轻工人去参加，他们离开时一头雾水：“这些学生整天都在争论投票选举领导人是不是不民主，他们能有什么成果？”问得好。

与此相反，今天我们随处可见红旗。各地的青年都明确站在激进左翼一边，共产主义思想正在崛起。他们自觉地把阶级问题推到前台。

运动伊始，我们就看到西班牙国家境内的青年自发提出“迈向总罢工”（Hacia una huelga general）的口号，比工会采纳这一主张早得多。罢工的教师游行来到马德里太阳门广场的营地时，迎接他们的是这样的口号：“这是阶级斗争，我们决不讲和”（Esto es lucha de clases, no podemos hacer las paces）。

法国也是一样。法国青年高呼“公社万岁！”（Vive La Commune!）、“我们要再来一次1968年五月风暴”等革命口号的视频和照片四处流传。在共和国广场，他们用法语唱起了工人的战歌《国际歌》。一周后流传开来的激动人心的视频中，雅典的中学生们用希腊语唱起《国际歌》作为回应。在西班牙，内战时期的革命歌曲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首次在街头响起。在意大利，响起的是共产党游击队之歌《啊，朋友再见》（Bella ciao）。

多年来，革命共产国际始终反对所谓“左翼”中的一股舆论潮流。这股潮流只看到右翼煽动者当道、战争不断、媒体煽起反移民歇斯底里这些表面现象，就宣称我们生活在一个反动的时代，甚至法西斯主义已迫在眉睫。他们援引右翼的投票趋势和低迷的罢工数字，断言工人阶级麻木、落后而且种族主义。

唯有我们说：不，一股巨大的愤怒情绪正在积聚。尤其在青年中，这种情绪正急剧左转，走向革命的结论。暴风骤雨般的革命爆发正在酝酿之中。

我们收到的报告还表明，在这场意识的飞跃中，另有一点相当重要。青年们目睹了斯里兰卡、孟加拉国和尼泊尔的革命事件如何收场：街头压倒性的人群推翻了政府，接着新政府上台，却照旧按市场的指令施政。

相当一部分人已经懂得，这场运动将有起有落，不会一幕就演完；而只有我们组织起来，才能在退潮时保住一些东西。

革命共产主义者必须向这些青年敞开大门，像对待归家的同志一样对待他们，给他们组织、思想和方向，让他们发挥作用。

工会急忙追赶

在各地，最引人注目的是许多青年先进的革命意识和自称代表工人的工会和政党（尤其是但不限于其最高领导层）的保守之间的鸿沟。

青年正在大步越过这些组织。西班牙租户联盟这类规模不大、偶然形成的团体，就能号召起大规模抗议。在巴西，几周前第一轮投票前的那个星期五，劳工党召开了一场十分沉闷的竞选集会。在投票结果显示博索纳罗得票47%，卢拉得票45 %后，号召大规模抗议的不是劳工党，而是学生会；数以百万计的人响应号召，举行了愤怒、充满活力、洋溢着青春气息的抗议。

工会领袖们发现自己陷入了非常尴尬的境地。他们显然认为自己的职责是阻挡、遏制运动。他们根本没有革命的视野。但如果他们**不做点什么**，就有被越过、失去一切影响力的危险，在青年当中尤其如此。那样一来，他们又怎么扮演阻挡事态发展的角色呢？

因此，在西班牙，青年占领马德里太阳门广场的当天，激进的小工会CGT与租户联盟成员会面，讨论总罢工问题。正是这件事逼得两大工会联合会UGT和CCOO的领导人赶紧号召于11月11日举行总罢工。

他们定下一个舒舒服服的遥远日期，好把势头消磨掉，此后也几乎没有为罢工做任何动员。他们用颤抖的手点燃了导火索，又竭尽所能地压制、遏制后果。但他们不得不发出号召，因为害怕自己不这样做，别人就会抢先一步。

尽管如此，鉴于西班牙已经15年没有过总罢工，即便是工会领袖们这样战战兢兢的举动，也被人们热情地抓住了。他们得到的可能恰恰是他们最害怕的东西：工人阶级一场声势浩大的力量展示。

暴风骤雨般的事件也已来到意大利。该国南部被燃油抗议封锁。在北部，贫困青年通过TikTok组织起来，在米兰等城市与警察搏斗，几家奢侈品牌商店的橱窗被砸。CGIL如何回应米兰这场冲动的工人阶级怒火？组织一场维护“和平”的反示威！

不过，目睹了西班牙发生的事，又想起去年10月激进的小工会USB如何抄了他们的后路、号召了一场声援巴勒斯坦的总罢工，意大利总工会领导层陷入了两难。于是，总书记兰迪尼宣布于11月20日举行总罢工，并明确把它与同一天的欧洲青年反军国主义罢课联系起来。

法国总工会玩火

但最清楚地展现工会领袖所扮演角色的，仍然是法国。年复一年，法国总工会CGT的领导人玩的都是同一套犬儒把戏。他们不号召总罢工，而是号召“行动日”，让每个人自行组织抗议。这些行动日通常定在工作日，而既然没有罢工，工人们自然都在上班。

他们非但没有设法壮大运动，真正向政府和统治阶级下战书，反而为了**截断**上周末10月17日的动员，不是号召总罢工，而是在11月5日再搞一个“行动日”！

这理所当然地引发了群众对工会高层的强烈愤怒。时机的选择简直虚伪到了极点：日期足够遥远，可以让事态稍稍平息、消磨势头；又正好赶在期中假期，好让发起这场运动的中学生们远离街头。

但他们也许失算了。运动的广度意味着，不管放不放假，青年**都会**走上街头。10月17日的成功也意味着，从现在到11月5日将有一系列动员。

在任何不号召马克龙立即下台的演讲者都会被嘘下台的形势下，法国总工会领导人苏菲·比内为了保住对局面的掌控，被迫

让自己的言辞激进起来。她在这样做的时候说了一些话，让这个“行动日”有了全新的味道。

她从预算谈判中出来面对媒体时，说了下面这番话（粗体为笔者所加）：

> “是时候把动员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了。**罢工行动必须接过接力棒**。正因如此，法国总工会与工会联合阵线一道，号召在11月5日举行规模尽可能大的动员。**我们敦促所有工人在各处成立大会**：在每个工作场所，与所有同事一起，在每个行业、每家工厂，以扩大罢工、使罢工普遍化，无论是在11月5日当天还是之后。罢工行动：这才是必须摆在议程首位的事。**工人停工，国家就停摆，经济就瘫痪**。只有那时，我们的诉求才终将被听到。”

这些话她很可能日后会后悔！为了跟上激进的情绪，她现在被迫把11月5日说成罢工日，甚至号召工人组织全体大会，暗示这一天可能拉开一波罢工浪潮的序幕。

我们不要忘记，1968年五月的革命总罢工，最初只是5月13日一天的罢工行动，工人们却把它当作发动全面总罢工的信号；这样的总罢工，只能是一场争夺政权的斗争。

工会领袖们迈出的每一步，无论多么犹豫，只要真正推动运动前进，我们都欢迎。但我们必须警告工人：工会领袖们过往的记录表明，他们没有清晰的视野。他们远远落后于运动，并且正有意识地试图拖住运动！

此外，这场运动吸引了形形色色的阶层：中学生、大学生、黄背心、退休者、农民，而不仅仅是工会会员。

随着这些运动在全欧洲达到高峰，在最先进的地方，它们自然会提出建立更灵活的临时性组织的需要，来表达广大群众真正的情绪和核心诉求，而不仅仅是工会官僚乐于接受的那点残羹剩饭。

这才是对抗右翼的方法！

真正令人惊叹的是，在全欧洲，这些由革命青年领导的运动打破了统治阶级营造的种族主义、文化战争氛围。这才是**真正**对抗右翼的方法。

在西班牙，运动提出了非常激进的诉求，包括将企业房东的房产收归国有、签订无固定期限租约、租金减半。民调显示，83 %的民众至少部分支持运动的诉求，其中包括人民党（PP）和极右翼呼声党（Vox）各自65 %的选民！

与此同时，就在这当口，极右翼的呼声党正在准备选举，并公开主张削减教育和医疗开支、将养老金私有化。他们自诩的反建制形象已经千疮百孔。如今，呼声党和人民党的传统基本盘退休者们，正走上街头抗议他们！

形势发生了多么大的逆转！就在玛丽卡门被驱逐、被害的几周前，西班牙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叙事是什么？是一种反动的叙事：数以万计的移民从这块飞地的摩洛哥一侧游到西班牙属地休达之后，恐慌渲染和种族主义甚嚣尘上。

如今，青年们提出了一个绝妙的口号：“入侵者是投资者”（los invasores son los inversores）。激进左翼青年的阶级斗争方法，正在打破那套文化战争的废话。

在法国也是如此。走上街头的青年对右翼和极右翼充满仇恨，而国民联盟（Rassemblement National，RN）的选民中有55 %反对抗议……但这意味着另有45 %不反对。而且即便如此，他们当中仍有过半数支持中学生的诉求。他们分成了势均力敌的两半。

梅朗雄的政党“不屈法国”坚定地支持中学生和抗议，这值得肯定；该党的声势正强劲上升。与此同时，勒庞为了在六个月后的选举之前证明自己够体面，把重点放在哪里？放在呼吁镇压、证明自己的“财政责任感”上，誓言要削减1500亿欧元。而此时此刻，正是一代人以来规模最大的反紧缩运动！

改良主义的失败

这才是对抗极右翼的方法。当一个敢于斗争的激进左翼领导出现时，正如如今从青年中涌现的那样，较落后的阶层也能被吸引过来跟随它。阶级问题走到前台，文化战争问题退居其次。右翼原形毕露，手足无措。

在青年开始动员之前，缺的恰恰就是这样的引领。所谓“左翼”的老牌改良主义政党，在执行资本家所要求的种种攻击方面劣迹斑斑。

于是，我们面临一种讽刺的局面。这些运动让欧洲和其他许多地方的钟摆猛然向左摆动。然而，在选举战线上我们看到了什么？西班牙的呼声党、德国选择党、法国的勒庞、巴西的博索纳罗、英国改革党、葡萄牙的“够了”党。右翼煽动者正在崛起，其中许多人在下一阶段确实可能上台执政。

资本主义危机正在搅动整个社会。政治上落后的工人和中产阶层也被搅动起来。这些阶层在寻找出路，右翼正以煽动手法俘获一部分反建制的怒火。

这恰恰是因为软弱、搞阶级合作的所谓左翼和工会领导层一败涂地，留下了一片大开的真空。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阶层就无可救药地反动、种族主义。他们是可以被吸引到一个真正革命的替代方案后面的。

但在缺乏这样的替代方案时，改良主义人物试图借社会情绪捞取资本，我们看到他们的表现何等无力。在西班牙，西班牙工人社会党首相佩德罗·桑切斯犬儒地试图把自己装扮成住房运动的朋友。他向议会提交了几项微不足道的改革，结果被否决，于是他现在宣布举行大选。

但人们怎么可能对桑切斯抱有任何热情？他的政府执政八年，本有足够时间解决住房问题，却直到现在都无所作为。

在巴西，情况更为清楚。上百万人走上街头的运动是反对博索纳罗的，因此事实上是支持卢拉的。但条件是在谁的治下恶化到博索纳罗可能重新上台的地步？正是在卢拉治下。

因此，**尽管**卢拉和劳工党起的是那样的作用，反对博索纳罗的运动还是发展起来了。正如一名参加抗议的青少年对媒体所说：“我们是在为巴西而战，不是为卢拉。”在数百万人看来，这是一场争取民主的运动，反对美帝国主义在整个美洲大陆的侵略，反对公开反动、与军方勾连的右翼。

但这些青年中有一大部分人的眼光远远超出了卢拉，他们只想利用卢拉来击败右翼。他们正在摸索更加激进、甚至是共产主义的思想。

为共产主义而斗争

当前这波斗争远未到达顶峰。与此同时，欧洲资本主义的危机正日益加深。

就在本周，法国国债收益率23年来首次触及5 %。法德国债收益率之间的利差，让人想起2011年至2015年的欧元区危机。只不过这一次，处在风暴眼中的不只是希腊这样的小经济体，而是法国、意大利乃至德国本身这些核心经济体。这对整个欧盟计划构成了生死存亡的威胁。

国债收益率为何飙升？政府已无力偿还债务。如今债券市场忧心忡忡地看着这些软弱、遭人憎恨的政府，不相信它们能做到资本家眼中“必要”的事：通过紧缩让工人买单。

用《金融时报》的话说，法国被夹在“债券市场与街垒之间”。各国政府被夹在堆积如山的债务与群众的革命怒火之间。

10月17日之前，《世界报》在社论中警告勒科尔尼政府，不要向青年作出它承受不起的让步：“必须分清轻重缓急，哪怕这意味着作出不得人心的选择。”

10月17日之后，它的社论则告诫政府小心，别过度依赖镇压，指责政府造成了“灾难性的升级：动用的武力越来越多，使用武力时的克制与管控越来越少”。

这两点它都说对了。无论让步还是镇压，都无法让政府摆脱这场危机。

摆在面前的是一个阶级斗争激烈的时期。统治阶级太过软弱，无法给工人阶级以决定性的打击。它悬在半空，惊恐万状。它宿命般地知道，自己必须攻击工人阶级来“安抚市场”，但数以百万计的工人一旦动员起来，它又能拿他们怎么样？

但工人和青年也面临一个问题。他们的工会领导人当然没有要求过这场运动，而且正竭尽全力给它降温。青年们

自己已经呈现出替代方案的雏形：一个革命的、战斗的领导。但他们没有组织起来。

没有组织，即使是最强大的运动也无法取得决定性的突破。在法国1968年五月风暴之后的选举中，获胜的是戴高乐。这并不是因为工人缺乏斗志，而是因为他们的传统政党社会党和共产党不准备做当时形势所要求的事：夺取政权，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在当前的形势下，只有一条出路：工人和青年把政权夺到自己手中，组建工人政府，将主要工业和金融机构收归国有，把财富夺到工人阶级手中，开始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

唯一的另一个选项，也就是改良主义领导人所奉行的选项，是“管理”资本主义制度；而一次又一次，这只是把主动权拱手交还给了右翼。

因此，在这波不断高涨的斗争浪潮中，我们对革命青年要说的是：**组织起来**！我们邀请您加入革命共产国际。

转载：看清美国帝国主义的兴与衰

姜霆哲

在整整一个历史时期里，美国的霸权是无可争辩的既定事实。到1945年，美国生产了全世界一半以上的商品，握有全球约三分之二的黄金储备。亚洲、拉丁美洲和欧洲各国的政府，都是由华盛顿一手扶植、出资供养或撑住的。世界各国的统治阶级望着美国的力量，心中交杂着恐惧与敬畏。在台湾，我们的统治阶级长年以来更事事都要以美国作为榜样。（编辑部按：原文于2026年10月12日发表于革命共产国际台湾组织的网站“火花”）

时至今日，一名前综艺节目主持人入主了白宫两次，并借着执政团队翻天覆地地瓦解美帝在二战以后建立的世界资本主义秩序。同时，背负着40万亿美元国债的美国，不管是在对中国的帝国主义竞争中还是对俄国和伊朗的军事冒险上一次又一次地蒙羞，与此同时也疏离了其在全球各地的盟友。

不管台湾亲美的资产阶级媒体或者侧翼如何粉饰这一切，美国帝国主义的式微是一个人尽皆知的现实。但是，我们仍需要用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理解：美帝的衰弱本身代表着全球资本主义的衰弱以及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

资本主义帝国

当马克思主义者谈及“ 美帝国主义”时，并不是将当今的美国与过去的罗马、蒙古或奥斯曼那种意义上的帝国相比拟。美国帝国主义是人类历史内不同时期的产物：它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上的社会所达到的最高发展形态——在这种生产方式下，生产资料归私人所有，并被投入运转，为了其产主累积利润而生产出供市场买卖的商品，同时通过剥削实际运作这些生产资料的工人们的剩余价值来获取利润。美帝的兴起与衰落，走的正是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体制本身的生命周期。

也因此，要了解美帝的历史，就必须要了解资本主义如何在那片土地上登峰造极，又为什么在那里再也维持不下去。

从零开始

学校的教科书告诉我们：北美殖民地是由逃避宗教迫害的欧洲人所开拓的。但这只是历史非常小的一部分。被略去不谈的，是后来移民浪潮的阶级内容。

资本主义最早成形于义大利、西欧低地国家和英格兰的城镇之中，而那些拥有资本、财产但非爵位的商人和制造业主逐渐成为了现代意义上的资产阶级，也就是台湾学界有时候会音译成“ 布尔乔亚”的资本家阶级。在那里，这个上升中的阶级的利益处处撞上贵族与王权根深柢固的封建势力。而在大洋彼岸，王权的号令鞭长莫及。对一个有进取心的资产者来说，这恰恰就是北美的诱人之处。

用托洛茨基的话说，当时的欧洲“把自己人口中最觉醒、最经得起磨练、最适合发展生产力的分子，一波又一波地抛过了大洋”。

结果，在这些北美殖民地上，虽然名义上是大英帝国王室的领土，但当地经济的实际主导者并非封建侯爵，而是这些在当地落地生根的资产阶级。

也正因为如此，当资产阶级的利益最终无法和大英帝国的利益共存共荣时，一场推翻旧统治阶级的革命就在所难免。

美国独立战争是一场真正的革命，与在它之前的荷兰革命和英国革命一脉相承。它有自己的革命党，那就是“ 自由之子”（Sons of Liberty）以及后来的“ 联络委员会”（Committess of correspondence）。当时被称之为“ 爱国者”（Patriots）的革命派有自己的报刊、自己的集会，内部架构和组织者干部，其中最杰出的领袖是山姆·亚当斯（Sam Adams）。这些革命资产阶级同时也得以赢得手工业者、小农、契约仆役等平民大众的支持，并关键性地动员他们起义反对英国王室。

但它毕竟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是为私产的利益而发动的。它所确立的选举权只限于拥有财产的白人男性。而当革命立国后，穷苦人民循着同样的逻辑得出结论，争取更彻底的民主，在谢司起义（Shays’ Rebellion）和威士忌起义（Whiskey Rebellion）中自己行动起来时，这个新生的共和国就把他们镇压了下去。

美国式道路

尽管如此，这场革命建立了当时仍然具有巨大革命性、进步性的资本主义体制，并在地大物博的北美展开了这个新社会制度。美国领土也从十三个州迅速向西扩张。

这一切发展的基础是相当生猛、灵巧的资本主义土地发展。列宁在论述土地问题时，区分了资产阶级发展的两条道路：普鲁士式的道路和美国式的道路。

在普鲁士式道路上，旧的地主经济缓慢地演变为容克地主经济，使农民遭受几十年极其痛苦的剥夺和奴役。

在美国式的道路上，由于没有欧陆的腐朽封建地主经济，农民们则“变成资本主义的农场主”，更加快速地将经济推向现代化和资本主义的发展。

美国式的道路是最迅速的一条。它以最快的速度发展生产力，也因此最快地创造出社会主义的物质前提。

这一切绝不是对美国资本主义道德上的肯定。这些发展都是建立在对美洲原住民族的种族灭绝清出来的，是靠对劳苦大众的暴行压住的。马克思主义者说美国资产阶级进步，并不是因为它仁慈。它之所以起过历史上的进步作用，是因为它扫除了生产的

桎梏，尽管这些桎梏都是用最残暴的手段扫荡的。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解释道：“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重心的转移

到19世纪中叶，美国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已经开始赶超欧洲。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评述1850年世界情势时写道：“美国最大的事件是加利福尼亚金矿的发现，其意义超过了（1848年的）二月革命。”

他们接着分析：

> “从发现加利福尼亚金矿到现在，仅过了18个月，而美国佬就已经着手建设铁路，修建大公路，开凿以墨西哥湾为起点的运河；从纽约到查理斯，从巴拿马到旧金山已经有轮船定期航行；太平洋的贸易已经集中在巴拿马，绕道合恩角的航线已经过时了…加利福尼亚的黄金源源流入美洲和亚洲的太平洋沿岸地区，甚至把最倔强的野蛮民族也拖进了世界贸易——文明世界。世界贸易第二次获得了新的方向。世界贸易中心在古代是泰尔，迦太基和亚历山大，在中世纪是热那亚和威尼斯，在现代，到目前为止是伦敦和利物浦，**而现在的世界贸易中心将是纽约和旧金山**，尼加拉瓜的圣胡安和利奥，查理斯和巴拿马。世界交通枢纽在中世纪是意大利，在现代是英国，而目前将是北美半岛南半部。”

但此时的美国资本主义发展仍需要面对一个巨大的障碍：奴隶制。

奴隶制对美国资本主义一开始是相当必须要的。奴隶种植的棉花是纺织工业的原料，也是北方和英国积累财富的主要来源。但起初进步的东西不会永远进步下去。到了1850年代，奴隶制度已经成为生产的绝对桎梏。北方把剩余价值投进机器和铁路，南方则把剩余价值投进更多的奴隶，并且处处都有理由阻挡全国性的工业发展政策。

因此，双方的冲突首先并不是一场道德争论，不论约翰·布朗（John Brown）这样的为废止奴隶制而牺牲的斗士何等英勇。那是两种不可调和的财产形式之间的碰撞，而最终更加工业化的资本主义北方的胜利，也代表着南方的蓄奴主阶级

作为一个阶级被消灭。也因此马克思主义者会把美国南北内战形容成第二次美国革命。

同时，美国资本主义经济也在北方的胜利后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诚如美国革命共产主义作家约翰·彼德逊解释道：

> “北方利用战争和其后续在全国范围内瓦解，或加速瓦解非资本主义的剥削和生产形式，还利用这场动乱巩固国家机构，为此后一个世纪的无限制资本主义积累和扩张建立政治和法律框架。”

以美元为例。战前，联邦政府发行的唯一货币是金币和银币，或称作投币。私人银行发行了数百种不同的纸币，在特定银行服务的有限区域内可以兑换成现钞。林肯的财政部长正是今天财富500强银行的命名者——萨蒙·蔡斯（Salmon Chase）。1862年2月25日，第一部《法定货币法》获得通过，联邦政府开始发行后来被称为绿钞的货币，这对经济的发展以及联邦政府的作用和权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美国废奴在经济上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私有财产剥夺之一，一整个统治阶级的生产资料被彻底没收。

而反革命一如既往地随之而来。在名为“重建第二阶段”，但实际上是联邦政府在总统安德鲁·约翰逊（Andrew Johnson）的主导下重新赞助前南方统治阶级的反革命浪潮中，南方的黑人工人被重新赶回债务奴役之中，并被“吉姆·克劳法”（Jim Crow）的种族分离政策囚禁了将近一个世纪。

从大陆强权到帝国主义强权

当单一的生产方式在整片大陆上取得支配地位之后，美国资本主义便进入了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所分析的那个阶段：金融资本的支配、银行与工业的融合，以及为寻找市场、原料和势力范围而不得不输出资本的冲动。

内战结束不到一代人的时间，美国就开始表现得和它的欧洲前辈一模一样，这绝非偶然。1898年，它对衰朽的西班牙开战，夺取了古巴、波多黎各和菲律宾。1904年的“罗斯福推

论”（Roosevelt Corollary）更宣告：华盛顿有权干涉拉丁美洲任何一个国家的内政。

作为一个新兴帝国，美国在菲律宾开始展现出任何帝国主义都具有的残暴本性：为了打击当地的反殖民游击斗士们，美军把农村人口成群赶进他们自己称之为“再集中营”（reconcentration camps）的地方，营区外围划出自由射击区，凡是在营外被发现的人一律枪毙。美国在菲律宾开战了数年的镇压战争。死于此役的菲律宾人数在20万到100万之间。

这套手法并非美国人的发明。西班牙在1890年代的古巴就用过，华盛顿当时还大声谴责；而英国此刻正在南非照做。但工业规模性质的集中营，的确是“自由民主”的美国的原创，比法西斯还早了几十年。

欧洲与美国

随后于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标志着：世界市场再也容不下所有列强同时扩张，于是它们必须转而用武力重新瓜分世界。托洛茨基由此得出结论：资本主义在世界规模上已经耗尽了自己的进步作用，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已经成熟。

事实正是如此。俄罗斯工人阶级在1917年夺取了政权，建立了世界有史以来第一个工人国家。1918年11月的德国革命则终结了血腥的一战。

然而，工人革命在俄罗斯以外遭到失败，而正是欧洲的精疲力竭把美国推上了第一把交椅。托洛茨基在1926年的一份演讲《欧洲与美国》中指出，这场战争“作为一桩毁灭欧洲、使欧洲衰败的生意，花了美国大约250亿美元”——比起当时躺在美国银行里的600亿，这不过是九牛一毛。其中100亿以贷款形式流入欧洲，加上未付的利息，“这100亿如今已经变成120亿，而欧洲正开始为自己的毁灭向美国付账”。

托洛茨基计算道，在大约50年里，英国和法国的国民财富各自约莫翻了一倍，德国的财富则不进反退，而美国的财富却从300亿美元涨到3200亿美元，超过英、法、德三国的总和。

接着便是那段读起来仿佛写于今年的预言。在报告的第二部分里，托洛茨基警告说：

> “美国愈是把整个世界置于自己的依附之下，它自己就愈是依附于整个世界，连同这个世界的全部矛盾和迫在眉睫的动荡。”

整个后来所谓“美国世纪”（The American Century）的核心机制就在这里，而这段话写下的时间，恰好比它的后果到来早了整整一百年。

美国世纪

造成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那些矛盾并没有被它解决，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踵而至。而在二战后浮上台面的，是一个分裂为两种社会制度的世界。

一边站着唯一一个有能力把整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撑住的资本主义强权——美国。华盛顿有意识地打造了这套机器：布雷顿森林会议设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并把美元确立为世界储备货币——也就是说，确立为世界资本主义的货币。

另一边站着苏联。它已经蜕化为一个工人阶级毫无发言权的官僚专政，但它的计划经济却在一代人的时间里把一个落后国家变成了工业强国。1945年之后，这个榜样扩散开来：1949年的中国、东欧，以及1959年的古巴，都是如此。

这就是理解整个战后秩序的关键。这一时期的绝大多数战争，性质上都是社会性的。韩战、越战，以及一长串的政变和反革命，都只有一个战略目的：阻止一种敌对的财产形式扩散开来。换言之，苏联和美帝之间的斗争是一种**社会性的矛盾**。

同样的目的也解释了战后繁荣的政治面。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在1948到1951年间投入130亿美元，替欧洲资本主义的重建买单，此外还替西欧和日本的大部分国防开支买单。这使那些政府腾出手来，让出了福利国家、公共医疗体系和不断上涨的工资。而这些让步买下了改良主义者和工会领袖的忠诚，也在工人阶级当中播下了对资本主义的深深幻想。

这里有一个自由市场的辩护者从不提起的事实。美国世纪的那些技术飞跃，并不是市场自发的产物，而是国家主导的结果。晶体管、电脑、卫星通讯和太空计划，都出自贝尔实验室、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这类机构，由五角大厦和联邦政府出资并主导。1964年，美国国内所有研发活动中，有67%由联邦政府出资。

资产阶级之所以容忍这一切，是因为它被卷进了一场自己可能会输的竞争。面对一个敌对的制度，美国资本主义不得不做出一些放任自流的资本主义绝不会做的事：制定计划、进行长期投资，并且对工人阶级做出一定的让步。

亚洲的读者不会看不出其中的讽刺。把国家资源导向战略性技术、并与最大的垄断企业协同行动，正是今天中国在做的事，也正是华盛顿如今斥为“ 不公平地扭曲市场”的手段。

毁了他们的那场胜利

但俗话说得好：盛极必衰。事情总是会进入其反面，而兴盛的资本主义帝国由于立足在一个逐渐会被历史淘汰的社会制度上，也会随着其整体的衰弱进入式微。

事实上，美国相对衰落早在冷战结束之前很久就开始了。到1971年，美国已经无力履行美元兑换黄金的承诺，尼克松宣布停止兑换，亲手拆掉了华盛顿自己在布雷顿森林建起的货币架构。接着是越战的失败，而战后繁荣也让位给了长达十年的停滞性通膨。

同时，美帝国主义也不是所向披靡的。美帝花了20年反击越南革命以防止“共产主义”扩散的企图，最后不仅以失败告终，更激起了国内群众和年轻人的巨大反抗，美军内部一时之间也近乎濒临崩溃。

而此后的1980年代，美帝国主义在维持对外干涉之际，也重新展开了对自己工人阶级的攻势，大量的福利削减和私有化接踵而至，是为所谓“新自由主义”时期的开始。但这并不是某种特别的资本主义，而是资本主义不可避免的结果。

然而此时在苏联、中国和所有实施官僚而非民主计划经济的国家内，官僚问题的累积最终如托洛茨基在1936年的《被背叛的革命》内解释的，会成为新社会的绝对桎梏，如不以工人民主和世界革命的复兴移除，那整个社会就会面临崩溃。这也发生了。

不论我们如何看待统治苏联的那个官僚集团，苏联的崩溃都是世界工人革命的一次严重挫败。我们当时所争取的，是由工人阶级发动一场政治革命，推翻当时的官僚独裁统治，并在工人民主的基础上重振计划经济，并重启世界革命浪潮。而实际发生的，却是资本主义的重建，不论是在苏联尸体上建立的俄罗斯，还是在政权没有垮台但积极主导资本主义重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西方的意识形态家宣告历史已经终结。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宣称自由民主与自由市场已经永久取胜，《纽约时报》的汤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则用他的“金拱门理论”为那个时代写下了完美的墓志铭：任何两个都有麦当劳的国家，从来不曾彼此开战。

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则了解，当时的资本主义实际上拿掉最后一道外部约束，反而加速了腐朽。

既然再没有一个敌对制度可供畏惧，美国统治阶级也就没有理由再接受冷战强加给它的纪律。既然金融工具、房地产和股票回购能带来高得多的报酬，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虚拟资本、一种不创造任何东西的价值索取权，那又何必把资本埋进长达数十年的工业项目里？

柯林顿任内的松绑管制放任金融资本横冲直撞，欧洲也被美国逼着跟进。经济快速地被寄生性的金融资本和大银行所控制。各种金融产品充斥市场并大力引诱一般百姓开始贷款消费，或者将储蓄花在股票和其他类型的金融赌博。在1989年到2001年之间，美国人民的信用卡债翻了三倍，高达6920亿美元。储蓄率大幅下降，而个人申请破产率也增长了125 %。

于是国家从主导投资的位置上撤了下来。美国研发经费中联邦政府所占的比重，从1964年67%的高峰跌到2022年的18%，企业所占的比重则升到75 %。

网络泡沫、接着是2008年的崩盘，就是这样来的：过多的资本找不到生产性的投资出路，只好在世界市场上豪赌，最后把整个体系拖垮——而每一次崩盘之后，金融资本又进一步集中到更少数人手里。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描述过的每一个过程，都以典型的形态重新出现了。

与此同时，生产基础被掏空了。美国在世界制造业中所占的份额，已经从2005年的22%跌到2025年的17%，中国则从9%升到27%。

军事上的界限也在同一时期显露出来。美国能够推翻塔利班和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却无法征服阿富汗或伊拉克。占领反而成了一个无底洞，不断消耗着本应用来投射美国力量的那些资源。

资本主义的烂账谁在买单?

在经历了将近20年的去工业化和产能外迁后，美国如果要重振自己的竞争力，面对来自中国的竞争，就不可避免地需要再度投资工业。然而，要做到这一点在美国这样老朽且面对着层层被不同资本势力控制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可谓难上加难。因此除了造成相当危险泡沫的AI产业外，其他川普试图用保护主义和霸凌盟友来促进的工业投资时数乏善可陈。同时，为了“ 促进投资环境”，就必须要拿工人阶级的薪资和工作环境开刀，维护资本家们的利润。

如今，美国经济已经是一大笔烂账。美国资本主义是世界上最大的欠债国。光是利息支出，2025财政年度就达到9700亿美元，如今每年超过1万亿美元，是联邦政府仅次于社会安全支出的第二大开销。这笔钱什么也生产不出来，纯粹是美国国家向它的债权人缴纳的贡赋。

同时，社会不平等已经被提高到天文数字的。2025年，美国最大企业执行长的薪酬是员工薪资中位数的312倍，比前一年的285倍又高出一截。而且别提什么百分之一了，美国最富有的19个家族如今握有12%的全国收入。另一方面，上周发表的一份调查发现，55%的美国工人拿不出500美元的存款来应付一笔突发开销，41%的人在过去半年里曾经看不起病、吃不上饭、缴不出房租或修不起车。而这还是在伊朗战争的代价尚未完全显现之前。

工人没有自己的政党

川普就是从这片土壤里长出来的。数以百万计的工人投票给一个告诉他们“这套制度被DEI和深层政府做了手脚”的亿万富翁地产开发商，这一点也不神秘。这套制度确实被统治阶级做了手脚，并准备更进一步拿无产阶级的利益开刀。而美国没有一个群众性的工人政党，因此工人阶级也没有任何政治力量能提出一条认真的出路。

填进这个真空的，是煽动家川普：他把民众对一个真实存在的权贵集团的真实怒火导引出来，自己却百分之百属于那个集团。于是就有了公开艾普斯坦档案的承诺，也于是就有了他食言之后自家基本盘的反叛。毕竟，他不可能揭穿统治阶级阶级，因为他自己就是其中一员。

美帝的衰败与台湾的关系

而在太平洋的另一端，在台湾的资产阶级政府也深受美帝衰败的影响。

中华民国政府在台湾的存留与发展，本质是作为美国帝国主义在亚洲的重要“反共”滩头堡。从蒋氏威权政府到现在解严后的资产阶级民主政府，于1960年代开始的“ 台湾奇蹟”得以发展。依靠的是美国主导的世界市场、美国提供的军事支持与资本投资，以及冷战所形成的东亚政治经济秩序。

美国与台湾没有正式外交关系，却长期维持高度密切的经济、科技与安全关系。美国政府自己也把台湾称为印太地区的重要伙伴，并将半导体、供应链安全、科技与投资列为双方合作的核心领域。

台湾资产阶级所谓的“ 亲美”建立在一个非常具体的阶级利益之上：台湾资产阶级政府与资本主义发展仰赖美帝的支持与市场，作为美帝的“看门狗”，这种政策与其说是一种外交选择，不如说是一种宿命。

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会因此“保护台湾”。恰恰相反。

对美国统治阶级而言，台湾首先是一个具有巨大战略与经济价值的资产。美国需要台湾的半导体，需要台湾位于西太平洋的战略位置，也需要把台湾纳入遏制中国资本主义与中国国家机器的整体战略之中。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台积电。台积电原本是台湾最重要的工业资产之一，如今却越来越深地被拉进美国的产业战略。2025年，台积电宣布将其在美国的计划投资提高到1650亿美元，包括新的晶圆厂、先进封装设施与研发中心；截至目前，亚利桑那第一座晶圆厂已经进入量产。

这种状态下，台湾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也就越来越受到美帝资本配置的支配。工人没有决定工厂盖在哪里的权力，没有决定技术应该服务什么目的的权力，更没有决定台湾应该如何面对中美帝国主义竞争的权力。

决定这些事情的是美帝国主义者。

更重要的是，美帝越衰弱，它就越需要盟友承担维持帝国秩序的成本。

台湾的国防支出已经可以清楚看见这种趋势。台湾政府公布的2026年国防预算，依北约标准计算达到9495亿元新台币，占GDP的3.32%；其中国防部本身的预算达8060亿元，比前一年增加25 %。

对台湾资产阶级政府更致命的，是美国对于台海问题的态度。这从俄乌战争的进展上就可以看出端倪。

先前，拜登政府试图以打败普京来吓阻中国崛起，从而背后促使乌克兰撕毁明斯克协议，大力加入北约，给予普京入侵的理由。但在几年的战争后，俄军反而成为欧亚大陆上最强大且最具实战经验的陆军，俄国经济也成功转型成完全摆脱西方经济秩序，免受制裁影响的状态。

在拜登拉着欧洲各国一起进逼把欧洲拉进这场饭局后，川普现在又急着离席让欧洲买单。他本人对于乌克兰的支持几近归零，而美帝统治阶级也逐渐走向抛弃乌克兰的道路，欧洲独自面对俄国的状态下，乌克兰战败只会是时间问题。

而在上次北京川习会的态度，美国明确表示他不想要一场万里开外的战争，并把台美军售视为与北京谈判的重要筹码，而拒绝对于“ 遏制北京夺取台湾”做出任何承诺，甚至表示“ 习近平是聪明人，他不会打台湾”。对于台湾，他则是又打又骂，去年突然威胁强征关税差点触发台湾经济危机，前几周又重提要对台湾芯片征收200%关税。

毫无疑问地，如同乌克兰，美帝从来都只把台湾当成棋子，需要的时候为其所用，不需要的时候随时可以抛弃。

而在当下的伊朗战局中我们看到美军的表现，更是显示这一切并不是一种主动的外交转向，更是美帝意识到自己的衰败所做出的战略收缩，未来中美竞逐将从美国强力作为警察的干预转为更加不稳定的“多极世界”。

这不意味着世界更加和平或是均衡，相反，它如同1914一样，是一个大家坐在火药桶上，战火四处都可能爆发的危险之中。

对于台湾资产阶级政府而言，这更代表着美帝的支持越来越不可靠。他们失去了狐假虎威的靠山，台湾政府面临独自面对中帝入侵的处境。但是这不代表民进党政府会跟中帝斡旋，相反我们看到更多无意义的仇中宣传，民族主义情绪高涨，赖清德政府似乎想用这种方式至少维持着“抗中保台”叙事，以拱卫群众对自己的支持。

对于台湾工人阶级而言，工人支付税金，工人承受军事化所带来的社会资源排挤，工人的子女可能被征召，工人承受战争风险。而战无论谁赢，输的都是台湾工人阶级和青年。

反动的堡垒——也是革命的摇篮

回到美国，尽管我们在川普胜选前就理解，他不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将加速美帝的混乱和式微，但我们革命共产主义者没有借酒浇愁，也没有宣告法西斯主义已经降临。我们说的是：他必然会让投票给他的工人失望，而这将开启一场急剧的左转。

这正是眼下正在发生的事。今年1月，明尼苏达州各地的工人罢工、游行、迫使企业停业，抗议移民与海关执法局（Immigration and Customs Enforcement，ICE）的突袭搜捕和

Renée Good 遭杀害一事。约有5万人在摄氏零下29度的天气里走上明尼亚波利斯街头，并促成了当地经济的全面停摆。事后约有四分之一的明尼苏达选民表示，自己或近亲参加过。工会领导层虽然为这场行动背书，却没有号召自己的会员出来——但“总罢工”这几个字重新进入了美国政治，这件事意义重大。

被美国政府控诉谋杀并等待受审的Luigi Mangione所受到的社会同情也是另一征万亿：大量的普通老百姓明白此案内所谓的“受害者”，也就是医疗保险公司巨头的执行长，才是真正杀人无数的凶手。

统治阶级感觉得到脚下的地面正在松动，这就是川普为什么抄起了美国武器库里最老的那件武器。据路透社统计，光是6月底的两周之内他就把共产主义搬出来讲了81次，把胜选的左翼候选人骂成“死硬的、无神的共产党人”。而这正在以壮观的方式反噬他自己。

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Democratic Socialists of America，DSA）在7月4日突破了12万名成员，比尤金·德布斯（Eugene Debs）的社会党在1912年的高峰还多。它并不是一个共产主义组织，它在资产阶级的民主党内部活动的策略是模糊阶级界线，而不是把界线划出来。但它的增长本身衡量着某种真实的东西。

民调也说明着同样的事情。根据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7月的一项调查，对共产主义持正面看法的比例一年之内上升了7个百分点，达到21%，而在Z世代当中这个数字是38%。同月《华尔街日报》的一项民调则发现，51%的美国人认为资本主义运作不良或根本不可行，2015年这个比例还只有37%。

所以美国的局势并不是一片密不透风的反动。美帝国主义仍然是世界反动势力的堡垒。但同样是这个国家，集中了地球上最庞大的生产力和最庞大的无产阶级之一，而后者正逐渐站出来对抗这个全球最反动的资产阶级。

1934年，托洛茨基在《假如美国转向共产主义》中写道：“美国人的性情精力充沛而又激烈，在共产主义稳固地建立起来之前，他们非得打碎不少碗盘、掀翻不少摊子不可”，而且“美国人首先是狂热者和运动家，其次才是专家和政治家”。美国人接受新思想可能很慢。可是一旦接受了，效果就是爆炸性的。

从日前在一位致信革命共产国际的科罗拉多州读者的来信中，我们可以窥见这种爆炸性未来的缩影，我们也以他的话为这篇文章作结：

> “我曾经是个保守派，也当过兵。我参与了美国对那些不过是在保卫自己家园的人民所发动的不义战争。这逼着我去质疑自己的信念、去读书，结果却发现：我不但不是保守派，我还是个共产主义者。这改变了我的生命，也改变了我看世界的方式，如今我这辈子唯一的目标，就是带领人们走向自由，把这个世界转变成共产主义的世界。”

阶级斗争专栏：为什么现在还没有革命？我们又为什么需要革命的领导？

艾伦·伍兹

（按：本文为《捍卫马克思主义》杂志中文版第4期内的主题文章，写于2022年3月，旨在从长剖析革命领导、革命党和群众运动之间的关系，借此提炼出致使革命成功的因素以及革命家们当下的任务。译者：Affroins）

> “人们并不乐于从事革命，就像不乐于从事战争一样。但是，区别就在于在战争中逼迫手段起着决定性作用，而在革命中就不存在逼迫手段，如果不把形势的逼迫计算在内的话。革命是在没有其他道路可走的时候才会发生。”（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第43章，《起义的艺术》）
>
> “**一旦**时机成熟，你们那里的事业就会得到异常迅猛的发展，但在此以前，可能还要经历不少时间。”（恩格斯，1891年10月24日）
>
> 凡是存在的，都是应当灭亡的”

仅仅重复关于社会主义革命不可避免的一般性陈述是不够的。人们必须知道如何解释为什么这是正确的。黑格尔指出，科学的任务不是积累大量的细节，而是获得理性的洞察力。而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

在左派内部，甚至一些马克思主义者，经常引用无穷无尽的经济统计数据的清单，这些数据是很容易在资产阶级报刊上所能阅读到的。然后在最后，他们总是得出一个结论，即“社会主义是答案”或类似的话。这可能是完全正确的，但它是一个不根植于事实和状况的结论，因此几乎没有或根本没有有效性。这种机械式的方法仅仅表明了精神上的懒惰，并会让那些以前听过它的人产生厌烦和不耐烦的反应。

抽象的表述和图式将无助于我们理解现在所正在经历的阶段的具体现实，仅仅重复关于资本主义危机的一般口号也不会帮助我们，这些口号仅仅因为重复的事实就失去了所有的力量和相关性，并逐渐沦为空洞且毫无意义的陈词滥调。

我们必须紧跟着情况在每个阶段的具体发展。且我们有义务回答这个问题，其也肯定是在很多人的脑海中所存在着的：你们马克思主义者说资本主义体制正处于危机之中，并且这显然是事实。但是为什么没有发生革命呢？

这个问题可能看起来很幼稚。但它比你想象的更需要去认真对待。且它值得仔细考虑。说实话，即使是一些自称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也会问自己同样的问题：**如果危机在现在已经如此深刻的话，那为什么群众还没有起来呢？**

我指的是那些所谓的运动主义者，他们表现出一种对思想和理论极度蔑视的态度，他们想象着像无头的鸡一样到处乱跑，喊着革命，想要以某种方式去引爆群众。

……

这些“运动家”对群众缺乏耐心，当他们不断重复着空洞的“革命”的口号时——就像是疲惫的老牧师喃喃自言的咒语——而在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时，他们就会责怪工人阶级，变得士气低落并陷于不活动的状态。盲目的激进主义和无能为力的冷漠只是一体的两面。

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不是将温度计放在工人阶级的嘴下，试图确定它何时准备好行动。这样的温度计从未存在过，也永远不会存在。急躁并不能使事情的发展变得更加迅速。

情况对你来说进展太慢了吗？好吧，我们都希望它发展得更快一点。但这些事情需要时间，急躁是我们最危险的敌人。且没有捷径！托洛茨基警告说，试图在你没有播种的地方收割将不可避免地导致错误，无论是极左还是机会主义。嗓门不够大却还试着以咆哮来吸引群众注意的人，最终只会让自己喉咙沙哑，甚至完全失音。

但是，如果看了这篇短文，你真的要坚持知道工人什么时候会动起来推翻资本主义体制，我愿意给你一个非常准确的答案。

人们准备好后就会行动了，分秒不差。

地质学和社会学

人们会问“为什么没有革命”这个问题，这一事实表明的不仅仅是困惑。它也暴露了对革命的基本规律和群众获得意识的方式的完全无知。其既不是自动的，也不是机械的，而且，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这两者是密切相关的。

让我们一如既往地从基本原则开始。辩证法告诉我们，社会和地质之间有着密切的平行关系。我们的感官证据告诉我们，我们脚下的大地似乎是坚固的（俗话说“稳如磐石”）。但地质学告诉我们，岩石绝不是稳定的，我们脚下的地面是不断发生着变化的。

从表面上看，一切似乎都是平静而令人欣慰的坚固。但在地表之下，有一片由沸腾的液态岩石所组成的广阔海洋，难以想象的温度和压力正在寻找地球表面的薄弱点。最终，来自下方的主要压力逐渐增大，直至屏障被打破，在这一刻岩浆终于在剧烈的爆炸中突破到地表，实现了在火山喷发中被压抑的巨大力量。

在这里，我们与人类社会进行了非常精准的类比。从表面上看，一切都很平静，只是偶尔会受到震动的干扰，而这些震动会过去，让现状或多或少地不受干扰。现状的捍卫者允许自己被一切都很好的这种想法所欺骗。但在表面之下，有不满、苦涩、怨恨和愤怒，它们正在慢慢积累，直至达到不可避免的社会地震的临界点。

这种变化发生的确切时间点是无法预测的，就像不可能精确预测地震一样，尽管现代科学技术取得了所有进步。科学告诉我们，旧金山市是建立在地壳断层上的，即圣安德烈亚斯断层(San Andreas Fault)。而这就意味着，那个城市迟早会遭受灾难性的地震。

虽然没有人知道这会在什么时候发生，但这是非常确定的。同样可以肯定的是，在资产阶级及其雇佣的战略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家最不期望的时候，革命的爆发就会发生。

托洛茨基用 “革命的分子性过程”，一个非常形象的短语来指代这种过程，它在工人的头脑中以不间断的方式进行着。然而，由于其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影响社会的总体的政治面貌，所以除了马克思主义者之外，谁都没有注意到它。

但并不是每个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人都掌握了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原理和方法的。我们在1968年5月的法国看到了这种情况，当时像曼德尔(Mandel)那种无知的宗派主义者将法国工人完全抹黑为“资产阶级化”和“美国化”。不到400万的工人是工会成员，但有1000万的工人在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革命总罢工中占领了工厂。然而，这样的爆炸能否带来一场成功的社会主义革命，则完全是另一个问题。

1968年，法国工人夺取了政权。戴高乐总统告诉美国大使：“我们都玩完了。共产党过几天后就会掌权。”而这则是完全可能的。但如果它没有发生，那么错误不在于竭尽全力进行革命的工人阶级，而在于领导层。这是我们稍后会回来阐述的中心问题。

成功革命的条件

为了成功，社会主义革命需要一定的条件。这些都有客观和主观的特征。

仅仅经济危机的事实——就其本身而言——不足以引发一场革命。生活水平也不会下降。托洛茨基曾经说过，如果贫困是革命的原因，那么群众将永远处于反抗状态。

一些宗派主义者表现得好像群众确实处于永久的反抗状态，随时准备进行革命。但事实并非如此。资本主义体制深陷危机，是

不言而喻的事实，无需论证。然而，大众如何看待这一事实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数年、数十年积累的错觉不会轻易消除。需要一系列深刻的冲击来破坏现有的平衡。

诚然，客观地说，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不仅存在，而且已经成熟了一段时间。事实上，它们有些过熟了。但人类历史是由男人和女人的行为所创造的。作为唯物主义者，我们知道人类意识一般不是革命性的，而是极其保守的。人类的思想极其厌恶任何形式的改变。

这是我们从遥远的过去所继承下来的一种根深蒂固的自卫心理机制，它早已从我们的记忆中抹去，但却在我们的潜意识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这是一条植根于自我保护愿望的法则。

结果，群众的意识总是倾向滞后于事件，而且这种滞后可能是相当大的，它受制于以前的全部经验。这是我们在分析当前形势时所必须时刻牢记的事实。

有句传闻是来自中国的一句句老话告诉我们，出生在乱世是最大的不幸。当脚下的大地开始摇晃；当古老的寺庙和宫殿倒塌时——那是一开始最令人不安的经历。

人们会到处跑，试图找到安全的地方。但是在旧的道路中，是找不到安全的地方的。因此，必须摒弃旧的道路，寻找新的道路。深刻的冲击已经开始动摇人们对现有社会的信心。

然而，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大多数人在他们出生和在大部分时间生活的这个世界中的熟悉的环境里会感到更安全和更舒适。即使在不景气的时候，他们也会顽固地相信明天会更好，“正常的时代”最终是会回归的。

而当革命者指出革命的必要性时，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摇头说：“我认识的魔鬼总比不认识的魔鬼要好一些。”这是一个非常自然的反应。革命是黑暗中的一次飞跃，谁知道会把他们带到哪里？

惯性的力量

统治阶级手中握有非常强大的武器来捍卫其财富和权力：国家、军队、警察、司法机构、监狱、媒体和整个教育系统。但其武器库中最强大的武器并不是这些东西。它是常规的力量，是力学中惯性力的社会等价物。

惯性力是适用于所有物体的众所周知的定律，它规定它们将始终保持在其状态，无论是静止还是运动，除非引入某种外部原因使它们改变这种状态，此时这一节点它被称为阻力或行动。而同样的法则也适用于社会。

资本主义孕育了人们终生的服从习惯，这些习惯很容易从学校转移到工厂生产线，再转移到军营。

传统和日常生活的沉重负担挂在人们的大脑上，迫使他们服从它的判断。这意味着群众，至少在第一时间，总是会走阻力最小的道路。但最终，重大事件的重击将迫使他们开始质疑影响他们一生思想的价值观、道德、宗教和信仰。

需要重大事件才能使群众摆脱这种毁灭思想的常规，迫使他们认识到自己的真实立场，质疑他们认为不容置疑的旧信念，并得出革命性的结论。这不可避免地需要时间。但在革命过程中，群众的意识一旦受到了巨大的推动力。它便可以在 24 小时的时间内完全转化。

我们在每次罢工中都看到了相同的过程。当一些最落后、最保守的工人突然转变为最活跃、最有活力的激进分子时，最先进的工人常常会对此感到惊讶。

罢工只是革命的缩影。在任何罢工中，领导层的重要性在意识的发展过程中都至关重要。很多时候，一个激进分子在群众大会上的一次大胆演讲就可能意味着罢工的成败。而这将我们带到了中心问题。

历史的主观因素

自发的群众革命运动揭示了群众的巨大力量。但只是作为一种潜在的力量，而不是实际的力量。在没有主观因素的情况下，即使是最激烈的群众运动也无法解决阶级中最重要的问题。

在这里，我们必须明白，社会主义革命同过去的资产阶级革命是有根本区别的。与资产阶级革命不同，社会主义革命需要工人阶级的自觉运动，工人阶级不仅要掌握国家权力的缰绳，而且要从一开始就自觉地控制生产力。

通过工人控制工厂的机制，它为民主管理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铺平了道路。过去的资产阶级革命根本不是这样的，因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需要任何计划或有意识的干预。

资本主义是历史上自发产生的，是封建制度下生产力演化的结果。资产阶级革命领袖的理论，就其存在而言，只是对新生资产阶级及其价值观、宗教和道德要求的无意识反映。

基督教新教（尤其是加尔文主义）与新生资产阶级的价值观之间的密切关系被马克斯·韦伯(Max Weber)详尽地揭示了出来，尽管作为一个唯心主义者，他把这种关系颠倒了。

一个世纪后，在法国，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在理论上为法国大革命奠定了基础，大革命大胆地宣告了理性的统治，而其在实践中则为资产阶级的统治奠定了基础。

不用说，无论是早期的宗教装束，还是后来披上的华丽理性外衣，其主导思想都没有真正代表资产阶级粗暴的、唯物主义的、贪财的利益。相反，这些伪装是绝对必要的，因为它是动员人民群众在未来主人的旗帜下反抗旧秩序的一种手段。

在这些理论没有充分反映（甚至违背）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的时候，它们就会被毫不客气地抛弃，取而代之的则是更适合新社会体制的其他思想。

在英国革命(English Revolution)初期，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不得不将资产阶级分子推向一边，以依靠最革

命的平民和半无产阶级分子完成对旧的君主制秩序的推翻。他代表在地球上的上帝的王国，以唤醒群众。

但完成这一任务后，他便转过头打击左翼，镇压平权派（Levellers），为资产阶级反革命打开了大门，其与国王达成了妥协，然后进行了所谓的1688年的光荣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最终确立了资产阶级的统治。清教徒的旧观念被抛弃，他们被迫移民到新大陆(New World)的海岸去实践他们的宗教信仰。

在法国大革命中也可以观察到类似的过程，雅各宾派的革命专政以巴黎无裤党(Parisian Sans-culottes)的半无产阶级群众的支持为基础，其首先被热月反动派和督政府所推翻了，紧随而来的是领事馆和拿破仑·波拿巴的独裁统治，最后在滑铁卢战役后由波旁王朝复辟。法国资产阶级的最后胜利是在1830年革命和1848年无产阶级的革命失败之后才得到保证的。

俄国革命

主观因素的关键作用在俄国革命中表现得非常清楚。列宁在1902年写道：

> “没有革命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在醉心于最狭隘的实际活动的偏向同机会主义的时髦宣传密切融合的情况下，必须始终坚持这种思想。”（列宁，《怎么办？》）”

他还补充说，“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同上）

而资产阶级革命的情况并非如此，原因我们已经说过了。但正如我们在1917年看到的那样，这对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是绝对必要的。

二月革命是在没有任何自觉的革命领导的情况下发生的。工人和士兵（穿制服的农民）表明他们足够强大，足以成功推翻统治俄罗斯几个世纪的沙皇政权。然而，他们并没有将政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取而代之的是，我们的双重权力(the Dual Power)流产了，其一直持续到在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下的苏维埃最终于11月掌权之前。[1]

为什么工人们没有在二月份掌权呢？当然，人们可以用各种“聪明”的论据来回答这个问题。甚至一些布尔什维克也断言，原因在于无产阶级必须遵守“历史阶段的铁律”，不能“跳过二月”，必须“经过资产阶级革命的阶段”。实际上，这些人试图通过诉诸“客观因素”来掩盖自己的懦弱、困惑和无能。对这些人，列宁轻蔑地回答道：

> “为什么没有掌握政权？斯切克洛夫说因为这个，因为那个。这都是胡说。问题在于**无产阶级的觉悟和组织程度不够**。这一点应当承认；**物质力量虽然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但是资产阶级却是自觉的和有准备的**。这是一件怪事，但是必须公开地、坦率地承认这个事实，并且向人民说明，没有掌握政权是因为没有组织起来和没有觉悟”（列宁，在出席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会议的布尔什维克代表的会议上的报告，我的重点。）

说得清楚一点：如果没有布尔什维克党的存在——事实上，如果没有列宁和托洛茨基这两个人的存在——十月革命就永远不会发生，它会被阻止并被反革命和法西斯政权在俄国的先行成立而告终。

换句话说，工人阶级的力量——这是一个事实——将仅仅作为一种潜力存在。而这永远不够。这就是历史中主观因素的巨大重要性。

中心崩溃

今天的整个局势都隐含着革命性的剧变。无论有没有革命政党，它们都会像夜晚过后就是白天一样发生。但是在阶级之间的战争中，就像在国家之间的战争中一样，优秀的将军的重要性是决定性的因素。而这就是问题所在。

群众正在努力寻找摆脱这场噩梦的方法。他们接二连三地看着一个党和一个领导人，一个个地丢进历史的垃圾箱。这解释了当前各国政治生活的极端不稳定。政治钟摆剧烈地向右摆动，然后又向左摆动着。

主要的受害者是那个特殊的一类人，中间派。这引起了资本战略家的严重关注，因为中间派代表了一种平衡左右极端并中和它们的支点。这是一个模糊的景观，所有清晰的分界线都被模糊到

无效的地步，空洞的言辞和模糊的承诺冒充了真正的硬币，或者至少是可以在某些未来（未指定）的日期中被赎回的债卷。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一中央在美国由共和党和民主党两个政党代表，而在英国则由工党和保守党代表，它们或多或少难以区分。但这一切都有物质基础。（布尔什维克编辑部注：而我们目前更进一步看到资产阶级建制中心的崩溃。在美国民主党声名扫地，共和党的特朗普人心尽失，而代表群众反建制和改良愿望的曼达尼在纽约当选，标榜自己为社会主义组织的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协会正在大举赢得选票。而在英国，两党制的衰落难以挽回，替代性的右翼改革党和左翼的绿党都在快速发展形成挑战，这也反映地是民众反对传统两党的强烈情绪。）

在战后时期，当资本主义享受着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时，英国工党和欧洲各大社会民主党进行了重要的改革，例如英国的免费国民医疗服务。而那个时期早已成为了历史。

如今，统治阶级甚至不能让旧的征服继续下去，更不用说进行新的改良了。旧的确定性已经消失，旧的稳定性也随之消失。到处都是动荡和危机。资本主义的危机就是改良主义的危机。

改良主义“左派”的作用

改良主义的危机和斯大林主义的崩溃意味着左翼出现了真空。既然大自然厌恶真空，那它就必须填补它。由于马克思主义趋势缺乏填充它的力量，那这个空间就将被左翼改良主义者所占据了。

苏联领导人庆祝十月革命胜利两周年，列宁和托洛茨基站在中间。

由于我们在这里无法处理的历史原因，马克思主义的真正力量顿时严重弱化。鉴于主观因素的弱点，当群众觉醒政治生活时，不可避免地会转向现有的组织和知名领导人，特别是那些有“左派”的资历的人。

因此，当前时期我们将看到左翼改良主义甚至中派（译者注：即在革命主义和左派改良主义之间的）倾向的兴起。但这些也将受到群众的考验，而且在许多情况下，它们只是短暂的。

认识到这一点，马克思主义趋势就必须对左派采取灵活的态度，在他们准备与右翼改良派作斗争时给予支持，但当他们在资产阶级公共舆论和右翼叛徒的压力下动摇、做出不可接受的让步和退却时，往往就要批评他们。

实现社会根本变革的愿望不能仅限于对计划和观点的清晰理解。它还涉及意志力的要素，即权力意志：即有意识地去赢、去征服、扫除一切障碍并且改变社会。

反过来，这必须基于对未来的愿景和对工人阶级改变社会能力的完全信心。但左翼改良派两者都没有。因此，他们便不断回避着中心目标。

他们推诿、拖延、寻求妥协，而这只是投降的另一种说法，因为在不可能的情况下寻求妥协，在不可调和的阶级利益之间架起桥梁，就是企图画方为圆。怀疑、模棱两可和优柔寡断是他们的内在本质。失败主义深深地植根于他们的灵魂和心灵。

当然，他们不能承认这一点，甚至对他们自己也是如此。相反，他们说服自己，即他们的道路是唯一正确的道路，且任何其他道路都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灾难。他们找到一千个欺骗自己的理由，并且如此确信着，他们更有能力去欺骗其他的人。

在许多情况下，左派都是诚实的人。是的，他们完全相信他们的论点是公正的。一个真诚的左翼改良主义者比一个不真诚的左翼改革者造成的伤害要大得多。他们的背叛不是故意的或有意识的。群众把他们全部的信任全都寄托在了他们身上，因此也就会被更加肯定地被带入失败的边缘。

马尔托夫无疑是一个非常诚实和真诚的人，也是一个非常能干和聪明的人。然而，他在俄国革命的命运中却扮演了非常消极的角色。

【布尔什维克编辑部：出于篇幅和案例时效性考虑，此处移除三节，其内容为对较早年的英国、西班牙和希腊改良主义案例的分析。感兴趣的读者请访问原文。】

情绪变化

当前的危机与过去的危机有着本质的不同——它具有深刻的国际性质。在过去的两年里，数以百万计的普通人一直在缓慢而坚定地得出结论。在看似平静的表面之下，到处都是巨大的不满。群众被愤怒、忿恨、一种强烈的不公正感，尤其是沮丧——无法忍受的沮丧所控制。

他们很少把话说出来，只是小声嘀咕，不能容忍目前的事态。而这种想法正在迅速普及就意味着，现有社会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在短期内，作为一项规则，他们还没有准备好对既定秩序采取直接的行动。

但无论有没有必要的领导，他们迟早都会采取行动，将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我们已经看到了很多这样的例子。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们在智利、苏丹、缅甸、黎巴嫩、香港等地看到了强大的革命或革命前的运动。（布尔什维克编辑部注：而我们今日有去年以孟加拉、尼泊尔、印度尼西亚、马达加斯加青年大规模抗议为代表的Z世代革命，如今由席卷法国、西班牙、阿尔巴尼亚、印度、巴西的新一波青年社会性斗争浪潮。）

这份名单的最新的增添上去的成员是今年年初哈萨克的群众起义，该起义始于石油工人抗议燃油价格上涨。那是一个警告。导致起义的同样压力也存在于许多其他国家。

> 科尔宾派被右路击溃了。这是为什么?当科尔宾在工党的普通党员中获得大量支持时，这怎么可能呢?而答案就在于左翼改良主义的本质。

统治阶级意识到了危险，资本的战略家们对来年做出了悲观的预测。有一段时间，工人的行动受到了冠状病毒的阻碍。但是现在有迹象表明阶级斗争正在复苏。飞涨的物价和下降的生活水平刺激了罢工的增加。

随着统治阶级在病毒大流行期间所表现出的犬儒主义、贪婪和利己主义的暴露无遗，民族团结那蛊惑人心的呼吁也遭到了质疑。一种不断积累的幻灭和愤怒情绪现在正浮出水面。对现状和现有政府和领导人的支持正在迅速下降。但这一切并不会自动导致一场成功的社会主义革命。

托洛茨基曾经说过西班牙革命，西班牙工人本可以掌权，不是一次而是十次。但他也解释说，如果没有足够的领导，那即使是最猛烈的罢工也解决不了问题。

长期的革命和反革命

1920年代和1930年代与今天的现状有许多相似之处。但也有重要的区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革命前的局势不会持续很长时间，并且很快就会被革命或反革命（法西斯主义）方向的运动稳定下来。

但现在情况已不再如此。一方面，统治阶级缺乏过去存在的群众性反动社会基础。另一方面，工人组织空前的堕落成为了一道坚固的屏障，阻止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因此，当前的危机将长期存在。随着潮起潮落，它可以持续数年，尽管无法准确地说出多长时间。

当我们说危机将长期拖延的时候，这根本不意味着它将是和平与安宁的。相反！我们进入了近代史上最动荡不安的时期。这场危机将影响一个又一个国家。工人阶级将有很多机会掌权。

局势中蕴含着突发、急剧变化的可能，可以在24小时的空间内转化。我们必须诚实地承认，我们有可能陷入常规主义的危险，被动地使用相同的旧方法，而无法利用提供给我们的新机会。

在这样的时期，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表现出最高水平的能量、决心和战术灵活性，并大胆地向正在走向革命方向的阶级伸出援手。

目前的情况可能会持续数年而不产生决定性的解决方案。但这种延迟并不是一件坏事。相反，它对我们非常有利，因为它给了我们时间——尽管不是世界上所有的时间！-建立和加强我们的组织；招募最优秀的工人和青年，教育和培训他们。

在任何地方，人们都看到政府的危机和民众日益的批评情绪，其直接针对于当权派及其所有机构。青年人尤其如此，他们对最先进的革命思想最开放。

群众伟大的学习过程已经开始。它似乎进展缓慢。但历史有它自己的规律和速度，这是由许多因素所决定的，且并不总是容易预先确定的。

我们收到了许多在青年中出现共产主义运动的报告。即使是在美国南部最保守的地区，也有一些激进的年轻人开始将自己视为共产主义者。

这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这些关键症状揭示了一些非常重要的某些事情，社会正在发生变化，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找到一种方法来利用它。

建构国际马克思主义趋势（今革命共产国际）！

【布尔什维克编辑部注：国际马克思主义趋势（IMT）已更名为革命共产国际（RCI），】

我们不得不面对事实：主观因素已经被一系列客观因素远远甩在了后面，这里不赘述。它以有组织的形式存在于国际马克思主义趋势的行列中，至少处于萌芽状态。

但是胚胎仍然是一种抽象的潜力。为了达到我们的目的，成为阶级斗争的实际力量，我们必须超越这个阶段。

IMT（ 今RCI）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所有国家，我们都在成长，而所有其他早已抛弃马克思主义的所谓左派，却在危机之中分崩离析。

我们对理论的坚持认真态度和对青年的关注使我们的进步成为可能。正如列宁所说：谁有青年，谁就得到了未来。然而，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还没有准备好面对我们最不期待的巨大挑战。

为使革命组织充分利用革命或革命前的形势，至少必须拥有最起码的有经验的干部和一个可行的组织。

一个渴望发挥领导作用的革命组织，需要一定的规模才能被工人阶级注意到。这样的事情不能在事件的热潮中即兴创作或建立。

归根结底，一切都取决于我们的成长。而这需要时间。托洛茨基在 1931 年 11 月写道：“在当今世界形势下，时间是最宝贵的原材料。”这些话在今天比历史上任何其他时期都更真实。

我们必须带着紧迫感继续前进。因为如果我们的力量不足以应对未来几年的挑战，那么重要的机会就会失去。我们必须做好准备！我们的口号必须是伟大的法国革命者丹东的口号：

“De l’audace , encore de l’audace , et toujours de l’audace ！”

大胆，大胆，永远大胆！

完笔于伦敦，2022 年 3 月 1 日

共产主义问答：当今中国严重的生育率问题，是否是女性追求地位提升的必然结果?

《布尔什维克》编辑部

2025中国人口生育率降至有记录以来最低，而近日国家统计局发表的数据显示：老年抚养比升至23.1 %，首次超过少儿抚养比22 %。这些现象引起的社会反应，以及官僚的恐慌让这不可避免的在未来会成为越来越重要的话题。生育率下降到社会无法再生产自身的地步往往指向一个社会面临着根本的腐朽和衰败。一个社会组织生产和生活的方法如果威胁到了人类的存续，那么它的极限暴露无遗。

随着老年人口从2025年的3亿2千万人增加到2035年预测的4亿人，中国社会将会和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一起老去。资产阶级的喉舌试图将此描述为“女性地位”的提高，开始大量接受高等教育、进入职场带来的正常现象称这是发达国家都会走过的路。言下之意是，这是中国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的必经之路，而打压女性地位，不让女性接受高等教育，进入职场，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马克思主义者如何解释这个问题？首先我们要理清一个根本概念上的问题,既然生育的影响是社会性的，是一整个社会代际更

替的问题，那么它的责任就不应该在个人，个人的境况和情感更不应该是被指摘的对象。

共产国际1921年代表大会的《共产党对妇女进行工作的方式和方法》就指出，“只有共产主义才能创造一种条件，使妇女的天赋职能——母性，不致和她的社会义务发生冲突”，天赋职能指的当然不是某种“神圣”的义务，而是单纯指只有生理意义上的女性可以生育这一事实。在资本主义下，生育所导致的脱离社会生产、不得不至少短期依赖于其他人才能维生的情况当然导致了生育对女性个人来说成为了沉重的负担，尤其在经济危机的情况下，面临着激烈的就业竞争、高昂的养育成本，越来越少的女性选择生育也就不足为奇了。

马克思说过，一个工人的工资最高上限是在特定社会和时间中维持最低劳动力再生产需求的劳动力价格，在女性有过高劳动参与率的社会，工资水平是在默认家庭中双方都参与工作来制定的。这意味着如果仍然选择生育的话，女性需要同时承担家务劳动和越来越恶化的工作环境。2021年第四次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报告显示在业女性工作日平均总劳动时间将近11小时，其中两个半小时是日常家务劳动，约为男性的两倍。

资产阶级国家当然也可以认识到这个问题的根源，但他们却给不出根本的解决方法。正如同在资本主义总危机中的其他社会部门一样，育儿福利即使不削减也不可能真正使生育的成本被社会接管。从2025年开始的3岁以下婴孩每年3600元的补贴很明显只是杯水车薪，并不能满足住房、教育、医疗、工作上的巨大压力。

不仅是资产阶级正在意识到生育正成为一个社会的存在性问题，年轻一代也正意识到这一点。22年上海疫情抗疫期间，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视频，一个白皮威胁抗议青年说“处罚后要影响你的三代”，这个青年高喊“我们是最后一代”。同年，北京天通苑的基层官僚被曝出用子女威胁抗议示威的民众，网络上关于“最后一代”拒绝生育的讨论又一次奉行。生育率低下反映的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的经济问题，更是被资本主义多重危机所摧残的年轻人对社会彻底的长期无信心。日本就是一个很好对照的例子——哪怕在政府真正大幅提高生育福利，建立免费

公立托儿所的情况下，生育率仍然无法提高，这就是青年对于整个社会丧失希望的后果。

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生育问题的社会压力就像社会中的其他问题一样，当劳苦大众对更好生活质量的普遍追求和社会整体现实看似产生矛盾的时候，这一矛盾往往是超出资本主义社会能够提供的条件的，不能单纯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局限之下得到解决。这个问题敏感的牵动着国家性质和职能、无产阶级的生活水平、社会风俗和观念、以及最根本的对未来社会的信心。我们不得不承认，面对着资本主义的危机、战争和动荡，生育这个人类存续的问题本身已经和社会主义革命紧密联系在了一起。只有一个全新的、消除了私有财产和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才能通过社会化的抚养、教育，以及免费、优质的医疗和男女同等长度的产假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经典：托洛茨基与今日世界的关联

泰德·格兰特（Ted Grant）1990年

感谢杨进翻译

按：本文是泰德·格兰特于1990年夏季托洛茨基遇害周年在英国战斗派刊物《战斗国际评论》（Militant Internationa Review）第44期上发表的文章，其中概括了托洛茨基如何从与列宁一同领导十月革命到对抗世界斯大林主义并传承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经验，并解释正统马克思主义理念如何与今日世界劳工群众的命运息息相关。

在列夫·托洛茨基（生于1879年10月26日）遇害五十余年和出生一百一十多年后至今，全世界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动荡和剧变。这可能是人类有史以来经历过最不安的世纪。

两次世界大战，俄国革命，斯大林主义的兴起，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胜利，中国革命，从公开军事帝国主义统治到第三世界经济新殖民主义的退却——这些都是本世纪的重大事件，标志着世界历史的决定性阶段。

现在，俄国和东欧斯大林主义政权的危机成为开启新历史阶段的第三个转折点。帝国主义列强忍不住窃喜。他们认为，他们成功地将东欧重新纳入他们的版图并一枪不发地打败了“共产主义”（实际上是斯大林主义）的威胁。然而，历史仍然未下定

论。我们在东欧看到的乱象远远不及于未来即将在西方世界爆发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随着危机的发展，左翼势力将再次脱颖而出。代表社会革命政策的“托洛茨基主义”将东山再起。

托洛茨基在他的自传《我的生平》中谈到了在1905年俄国革命爆发八年前，一个年轻的革命团体靠着一具手动复印机制作了一张抨击沙皇专政的传单。这是托洛茨基革命生涯的开始。当时的革命势力比现在要弱得多。然而八年后却爆发了1905年革命，而二十年后的1917年二月革命更推翻了近千年的沙皇专制。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是一个采用集中制的组织。党内于1903年意外地在次要组织问题上产生分歧，但却也预示了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未来的分道扬镳。正如托洛茨基日后解释道：这次分歧表现了“强硬派”和“温和派”之间的差异。托洛茨基本人当时跟随孟什维克大约一年，其后选择脱离并站在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主张之间。尽管如此，列宁的遗孀克鲁普斯卡娅在列宁逝世几天后给托洛茨基的致信中，澄清列宁一生都对托洛茨基保持着同样的态度。他理解托洛茨基可以扮演的角色。

1903年的争议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不如斯大林主义者后来声称这造就了社会民主工党内两派之间的立即分裂（成两党）。实际上有一次团结大会于1906年在斯德哥尔摩召开，其后一段短时期内，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再次齐聚一堂。直到1912年列宁才最终结论到推进革命的需要已经和与孟什维克维持联盟成反比。此时布尔什维克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政党。

1904年后，托洛茨基站在两派之外。但在1917年，他与布尔什维克携手并肩作战。当年3月，尽管列宁人在瑞士而托洛茨基远在纽约，但他们却各自独立对临时政府发展出相同的对策。二月革命后，身在俄国境内的布尔什维克领袖们，包括斯大林和加米涅夫在内，大都提倡与孟什维克结盟。托洛茨基坚决反对，列宁也当然是如此。然而当时情势正如托洛茨基所描述：“那时，克伦斯基集团好像无所不能，而布尔什维主义则被视为‘微不足道的一小撮’……党本身也还不能认清自己在日后的力量。就是在这时候，列宁却信心十足地率领它去完成最伟大的任务。我全力以赴地协助他工作。”（《我的生平》，第二十八章）

1917年9月7日，托洛茨基在《真理报》上写道：“国际主义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不像策列铁里和切诺夫等人只会将其充当口号但却一再背叛它[1]。对我们来说，国际主义是一个具体且完全实用的指导原则。如果没有欧洲的革命，一个持久的，决定性的革命成功（在俄国）是不可想像的……我们面对的不是不断的革命，就是遭到不断的屠杀：这是人类为自身未来抗争的筹码。”

正如托洛茨基评论道：“为了在反动年代里捍卫不断革命的前景，应该具备理论的预见性。为了在1917年3月提出为夺取政权而斗争的口号，应有相当灵敏的政治嗅觉。但在今天的领导人之中，不但没有一个人表现出具备预见能力……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能经受住历史的考验。”（《我的生平》，第二十八章）。因此，列宁断言，在托洛茨基认识到不可能与孟什维克结盟后，“没有比他更好的布尔什维克了。”

在《我的生平》中，托洛茨基还概述了红军是如何组织起来的，以及在喀山和其他地区的战役如何决定革命的命运。 “取胜的主要条件是毫不隐瞒真相，主要是不隐瞒自己的弱点，不欺骗群众，把一切如实地告诉他们。”（第三十三章）。这就是托洛茨基一生坚持的政策，从不试图向劳工阶级隐瞒真相。

托洛茨基在1905年的革命中，当选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更于1917年组织十月起义时担任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创造历史。这些成就，再加上而后筹组红军，足以让他进入历史的“名人堂”。但此外，托洛茨基与列宁更一同组建了共产国际。他们两人都认为这比是俄国革命本身还重要的任务。全世界的革命工人聚集在共产国际的旗帜下。它能够动员的群众规模甚至比世界各大宗教的崛起时还要大。它为劳工阶级不可避免发起的运动提供了有意识的领导。共产国际本身无法创造这些运动，但可以运用它们为世界革命铺路。

这就是列宁和托洛茨基创立国际组织时的原意。共产国际旨在为推翻资本主义做准备，为新的社会主义社会开辟道路。其主要工作是教育全世界透过阶级斗争经验而加入共产主义运动的新阶层和新干部，赋予他们完成任务的能力。这就是共产国际前四

届大会工作的意义。他们的论文和宣言，其中许多都是由托洛茨基撰写的，构成了革命的无价理论宝藏。

但改良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革命事件中拯救了资本主义。德国革命被社会民主党背叛，社会民主党拒绝接受“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血腥道路”，以实现资本主义的逐步，缓慢和和平的转变。遵循这个路线十五年后，反而让希特勒得以上台！

早期共产国际旗下的工人领袖们仍然年轻，理论程度仍然有待加强。但他们仍然有机会可以在当时发生的各个重大事件中学习，事实上他们也有逐渐开始领悟。德国革命的失败带给工人们许多痛苦的教训，共产党在革命和反革命之间的斗争的基础上成长为人数百万的群众政党。

1923年1月，在德国违约战争赔偿条款后，法国帝国主义者侵略了鲁尔。随着德国资本主义危机的爆发，这些事件导致货币崩溃。德国马克价值通货膨胀到达到了十亿马克只能兑一英镑的程度。德国发生了革命性的危机。但是，共产党领导层的动摇，以及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的糟糕建议，导致革命家们错失了大好革命良机。

1923年在德国的失败加深了俄国革命的革命孤立和群众生活在可怕经济情勢的失望中所发生的反动浪潮。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的“三驾马车”控制了苏共领导，开始了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实际上，这是反对列宁和十月革命本身基本思想的斗争。

在俄国境内的反动进程于1924年斯大林提出的“一国社会主义”理论中表现出来。 1924年2月，斯大林出版了《论列宁主义基础》一书，书中重申了由列宁提倡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观点，亦即社会主义是不可能在一个国家的境内建立的，更何况像是在俄国如此落后的国家。但六个月后同一本书却迅速再版，而斯大林在新版本中发表了完全相反的观点，即俄国有足够的资源来自行建设社会主义！这一说词被声称为安慰受到世界革命失败打击的俄国群众。实际上，它反映了新官僚阶层的利益，这个阶层在群众活动消退的基础上寻求控制苏联。

托洛茨基给出了一个警告和一个出色的预测：斯大林是一个经验主义者，在那个阶段，他并没有意识到他举动的后果，或者“一国社会主义”理论将如何导致世界各地共产党的民族主义和改良主义腐化。这个非凡的预测被后来事件发展完全证实。

托洛茨基的派系在1923年至1927年间于俄国共产党内发起了反对官僚主义抗争。他们提倡广泛工业化经济计划，遭到主张“蜗牛速度社会主义”的斯大林和现在被戈尔巴乔夫支持者们称赞的布哈林的反对。托洛茨基在他杰出的《列宁之后的第三国际》一书中解释了在一个国家建立社会主义的不可能性，尤其是像俄国这样的落后国家。他为争取恢复国际主义外交策略和恢复苏联工人民主，苏维埃的再生以及将权力交还给工人群众而奋斗。

他在英国革命问题上反对斯大林，布哈林，以及一定程度上，季诺维也夫。托氏预见了1926年的英国总罢工。他发起了反对共产国际在1925年至1927年的中国革命中支持蒋介石的自杀政策的运动，共产国际的政策导致了大批中共党员惨遭屠杀。

然而，托洛茨基对世界社会主义和劳工阶级运动的最大贡献是他对在俄国境内蔓延的斯大林主义的分析。没有他的研究，整个社会主义运动就会失明。他毫不留情地分析了“一国社会主义“理论如何将共产国际从世界革命的工具转变为苏联的“边防”。对此，官僚们于1927年将“托洛茨基主义者们”驱逐出苏共，并被流放到西伯利亚。

在那些年里，托洛茨基在共产运动内对他当时所认定的“官僚中派主义”进行了一场斗争。这个时期是斯大林和其他俄国革命领导人真正希望革命在其他国家取得胜利，却首先采取机会主义政策，而后转向疯狂的极左主义，突然发布认定社会民主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不是敌人，而是双胞胎的“社会法西斯主义”理论。这个路线为希特勒1933年的胜利铺平了道路。共产国际在1933年后则是从极左主义再转回到机会主义。在一系列著作中，托洛茨基处理了共产国际的恶性政策，并警告希特勒上台的危险，以及法西斯主义的胜利会对德国和世界工人阶级带来的后果。他主张社会民主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应形成统一战线，以防止希特勒夺政。

然而，共产国际从德国的灾难性失败中得不到任何教训，甚至声称希特勒的掌权是朝着革命胜利迈出的一步！甚至直到1934年2月，当法西斯主义者在法国对达拉迪尔的自由派政府进行示威时，共产党人居然与法西斯主义者一起示威。他们的行径很可能导致法西斯主义可以在1934年在法国上台。幸运的是，法国工人正确地看破了莱茵河事件的真谛，并迫使工会领导人组织总罢工。虽然工会组织的工人只有100万，但有400万人参加了总罢工，作为对法西斯分子的警告。

支持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改革的托洛茨基现在提出了必须在俄国境内发动政治革命和共产国际的革命性质不可避免地会遭到崩溃的看法。

随后，共产国际转向了“人民阵线”的策略，要求无产阶级服从自由主义者。托洛茨基在他关于西班牙和法国的著作中处理了这一问题。共产国际试图区分“好”和“坏”的资本家。不但没使用阶级标准，利用社会制度危机推翻资本主义，而是迫使工人支持“自由主义者”。这导致了工人们对政治情势的失望，从而为反动浪潮铺路。在法国，某些共产党领导人将这个反动的想法延伸成荒谬的结论，要求同“好”的法国法西斯主义者们和墨索里尼形成国民阵线来对抗“坏”的德国纳粹法西斯分子！工人阶级的失败为战争铺路。托洛茨基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将成为资本主义的决定性考验，从而导致西方的革命。事实上，整个西欧都发生了战后的革命浪潮。在英国，它使工党政府掌权。在法国，意大利和其他国家，它带来了社会主义和斯大林主义政党的联合执政。

但斯大林背叛了这场新的革命浪潮。他担心工人在其他国家取得胜利的影响会导致苏联内部官僚机构的崩溃。同样在1936年，由于担心西班牙革命对苏联内部的影响，斯大林发起了他的杀戮清洗，并为肃清“老布尔什维克”和托洛茨基的可怕大清洗审判做好了准备。

因此，资本主义在共产党和改良主义者继续执行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相同的政策下得以被挽救。然而，这并没有产生同样的后果，因为情况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情况略有不同。美国帝国主义在战后资本主义世界中的霸权为1950-73长期经济

增长铺平道路。那时美国占世界产量的50％。她用她的霸权迫使世界市场开放出口。通过降低关税和其他贸易壁垒，世界贸易大幅增加。这种世界贸易的扩张暂时延伸了资本主义，但另一方面也带来了更为进步的后果。它导致了无产阶级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数量，凝聚力和力量的增长，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也在落后国家中增长。

各国共产党和社会党的政策为相对稳定资本主义体制奠定了政治基础。但斯大林主义也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得到了加强。只有马克思主义者才能理解这些局势的变化，解释了红军胜利的后果以及东欧国家无产阶级波拿巴主义政策的转变。这是一种新的局势，只能通过使用列宁和托洛茨基的方法来解释，而不仅仅是在不考虑已经发生的根本变化的情况下重复他们过去的言词。

如今，斯大林完全被官僚机构所背弃。官僚们诅咒他应对今天困扰俄国的所有弊病负责。但斯大林仅是整个官僚机构的代表。正是这一点为斯大林带来了力量，另他得以在左翼反对派和官僚主义之间的战斗中战胜了托洛茨基。

托洛茨基阐述了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至1924年间由于他们生活环境的改变而发生的堕落。在《我的生平》内讨论列宁逝世的一章中，托式描述了整个官僚腐化的政治过程：

“使一定的世界观在头脑中扎根，使自己各方面的意识都服从它，并使自己的感情世界和它相一致——这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达到的境界，而只有少数人才能达到。这点在工人群众中被阶级本能取代……但是在党和国家里也有一批革命者，他们之中大部分虽然也是出身于劳动群众，但早已脱离了它。”（第四十一章）

随着以经济形势和革命在国际间的一系列失败为主的各种事态变化，布尔什维克们越发受到“异已或敌对的思想影响便会乘虚而入。”托洛茨基总结说，斯大林主义“首先是革命衰退时期无人性机关的产物。“（第四十一章）这是党内机器对党的独裁统治。

托洛茨基在一系列写作中进一步深化和发展了对斯大林主义的分析。他的最后一部作品《保卫马克思主义》是

在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想要改变马克思主义者对苏联态度的人的斗争中写成的。

托洛茨基认为，只要国家拥有生产资料，分配和交换方式，苏联就是一个畸形的工人国家。这是工人国家的根本特质。没有它，就不会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可能。但是，如果没有必要的工人民主和工人对工业和国家的控制和管理，就不可能有一个健康的工人国家。官僚机构成为一种特权阶层，在社会和工人阶级之上都是如此。它无法采取任何步骤建立一个更自由，更平等的社会，它试图维持现状，维持一个等级社会，增加自己的权力，特权，声望和收入，以极端恐怖统治工人。托洛茨基在1940年看到的这些特征花了五十年的时间才在苏联境内发展到最大程度。

第四国际内关于“捍卫苏联”争议的核心是关于苏联的阶级性质：

> “共产国际的‘保卫苏联’与昨天的‘反法西斯’统战一样，都以拒绝独立阶级立场为前提。 ‘敬爱领袖’呼来喝去的国际跟班坚持认为无产者——在各种条件下、以各种名义、但始终不变地——充当着一个有产阵营反对另一个有产阵营的帮手……我们的口号必须让工人清楚了解第四国际为何保卫苏联（生产资料国有制和计划经济），以及苏联政治革命的对象（寄生官僚及共产国际的帮凶）。时刻不忘总原则——推翻苏联官僚的斗争服从于保存生产资料国有制的任务，而保存生产资料国有制服从于国际革命的任务。”（《保卫马克思主义》，“战争中的苏联”）”

《保卫马克思主义》一书回应了各式各样的思想。被斯大林主义发展迷失方向的半“马克思主义者”们，如托洛茨基《先知三部曲》传记作者多依彻（Isaac Deutscher）。多伊彻妄想官僚可以朝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并可以解散自己的存在！今天的事件表明，这种理论根本是错误的。另一方面，如托尼·克里夫（Tony Cliff）这样的人提出了“国家资本主义”的观点，即官僚制是一种新的社会形态。这也完全错了。

拥有100%产权的国家政府的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完全不同。这样社会拥有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经济运作规律。例如，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必然会出现生产过剩和周期性经济衰退的危机。苏联和东欧的经济危机则具有不同的特点。[2]

而且，如果没有资本家，用马克思的话说，资本主义就是“生产资料的储存库”。在国家所有制的经济中，国家是生产资料的储存库。官僚不是企业家。作为经济工作人员和管理者，他们仅有权拿到监工的工资。如果他们得以借此获得更多收入，他们获利的途径也是纯寄生性的，而不是由于他们的经济功能。工人国家只能在工人的民主控制下才能正常运作。否则，俄国和东欧的所有负面现像都是不可避免的。或者，用托洛茨基的话说，“假如波拿巴独裁的混账们等于独立阶级，就意味着苏俄的现状绝非阶级斗争进程的偶然事故，而是有长久生命力的历史产物。”（《保卫马克思主义》，“再谈苏联的阶级性质”）

一方面，国有产权制已经证明了计划生产带来的巨大优势。另一方面，官僚独裁机器现已达到极限，甚至无法比兴盛时期的资本主义得到更高的成果！正如托洛茨基所解释的那样：“苏联工人推翻官僚专制的目标，是复兴苏维埃并剥夺今日当权者的统治地位。协助国际工人革命与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是苏维埃复兴后的主要任务。上述任务，顺理成章地要求保存苏联的国有制与计划经济，这就是全部论战的核心。”（《保卫马克思主义》，“战争中的苏联”）这份间接的纲领在托洛茨基写下它五十年后的今天，仍然完全保存其正确性。

托洛茨基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官僚层是社会肌体的临时肿瘤，抑或将进化成具备历史必要性的新器官？”他解释道”：

> “简约地说，各种统治阶级的历史存在价值，在于它所代表、引领的压迫体系使生产力升高了一个台阶。毋庸置疑，苏联现体制给经济带来强劲动力。但这一动力源自生产资料国有化与经济计划，而非干部篡夺经济指挥权的功劳。相反，现有官僚系统成了技术、文化进步的主要制动阀。 ”（《保卫马克思主义》，“战争中的苏联”）”

官僚机构现在处于无法发展生产力的地位。它现在不再是社会发展的相对性阻碍，而是绝对性阻碍。托洛茨基解释道：

> “这个基本事实长期躲在时代的幕布后面：近20年苏联忙于借鉴、消化先进资本主义的技术与生产组织的最新成果。这个模仿、引进的阶段，以各种方式与官僚的刻板气质——对基层创意与倡议的窒息倾向——共存并彼此结合。经济发展的

层次越高，它的社会要求越复杂，官僚独断衍生的阻碍越不可忍受。天长日久，老爷们彻底变身‘统治阶级’之前，便与社会发展处于针尖对麦芒的敌视状态。一切紊乱在于今日的苏联官僚并不代表与自身有机相连、彼此亲密无间的新经济系统，而是工人国家的寄生者。 ”（《保卫马克思主义》，“战争中的苏联”） ”

目前苏联的僵局显著地印证了此一分析。托洛茨基接着解释道：

“克里姆林宫的主人具备旧统治阶级的诸般恶习，但与后者曾有的历史使命无缘。苏联国家的蜕化，并非社会主义过渡通常规律的反映：相反，这一规律由于苏维埃国家的社会经济落后性以及资本主义包围，正遭受暂时（或曰例外）的挫折……十月革命不是撞大运的偶然事件。它被预言很久，而事变证实了预言；恶吏专权的现状也无法一笔勾销那些预言，因为马克思主义者从未设想过孤立的工人国家能长久支撑。领导十月革命之时，我们成天担心工人国家会立即遭到扼杀，很少考虑遥远的蜕化威胁；更准确地说，我们并未割裂地看待这两种可能，它们彼此也没有不可抗拒的矛盾：官僚蜕化至一定程度，不可避免地转向公开复辟。……社会革命是经济与文化体系最伟大的变革。这样的背景下，二十五年历史比一小时的生命更短。 “（《保卫马克思主义》，“战争中的苏联”） ”

官僚们维持自身统治地位的时间比革命家们预期的更长。这是由于二次大战中苏联取得的胜利。战争的胜利与官僚们的政策无关，而是反映了苏联群众不愿被希特勒法西斯主义奴役的决心。但是，正如托洛茨基接着说的那样，“在苏联，砸碎官僚专制是保存国有经济的前提”。这也现在再次得到了惊人的证明。

欧洲各国“共产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采取与资产阶级联合执政的政策，是对马克思和列宁所提倡的反对资本主义斗争的可耻背叛。他们在这个时期拯救了资本主义，并为资本主义经济增长提供了必要的政治喘息空间。现在东欧各国的斯大林主义政权崩溃了，或者如资本主义者更偏好断言：“共产主义”失败了。这个情况也明显地为资本家们提供了进一步喘息空间，俄国的斯大林主义危机深化了这个进程。

但是，马克思主义者们预言的斯大林主义危机仅仅是西欧乃至全世界资本主义危机的先兆。未来十年内资本主义国家也会经历动荡。在1968年爆发的法国革命并非意外。它反映了工人阶级在危机条件下不可避免发起的群众运动。

英国《卫报》于6月22日报导了已经在美国社会中出现的现象：“一般选民已经意识到他的家庭收入在过去20年内没有得到改善”。文中引用了最近出版的《富人和穷人的政治》一书，由自1968年来担任共和党智库的凯文·菲利普斯（Kevin Phillips）撰写。《卫报》记者评论道：“从这些新的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出里根年代的政策将社会转变成富豪统治的严重程度。当里根于1980年当选时，美国最富有的百分之一人口仅拥有8%的全国财富。到1988年，他们的份额几乎翻了一番，达到14.9%。 ”

“美国目前有近200万名百万富翁，15万余人身价超过千万，51人身价千万。福布斯400位富豪榜上的净财富在20世纪80年代几乎增长了两倍。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平均收入是1980年工人的40倍，现在的收入是93倍。 ”

这是即将到来事件的先兆。1920年至1930年之间发生了完全相同的过程，为1929年至1933年的衰退铺路。托洛茨基在他为《卡尔·马克思思想万岁》一书提的序文内指出：

“事实是，在资本主义发展最繁盛的时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经济矛盾更形恶化；在那时相当广大的某些等级的劳苦者的生活水平的提升，然而却看不到，无产阶级在国民收入中占得的一份却是减少了。就这样，美国的工业生产在转入疲惫时期之前，从1920－1930年跃升了50 %，而同一时期支付给工人的工资总额，只增加了30 %。换言之，虽然有桑巴特言之凿凿的保证，劳工在国民收入占的一份却是大大地减少了“ 。（“当代马克思主义”）”

历史在更高层次上重演。至少比起过去，无产阶级国民收入的份额有所增加。然而，现在无产阶级的份额在过去20年中已经下降。这意味着经济中的矛盾已经达到了比1929年至1933年更大的程度。当然，我们无法完全精准地提前预测危机什么时候会到来。有可能需要花好几年的时间发生，也可能在1991年就出现经济崩溃。但可以肯定的是，同样的经济原因会产生同样的经济影响。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苏联官僚们可能正好在新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动荡的前夕投降于资本主义。西方资本主义的繁荣“烟

火”将在后期准备不可避免的崩溃。东欧和俄国发生的危机预示着西方资本主义以及欧洲，北美和亚洲将面对的类似危机。资本主义将会在世界范围内衰败。

在近来罗马尼亚发生的革命中，世界资产阶级的恐慌表明了资本主义目前的经济和政治稳定度有多浅薄和脆弱。

因为担心革命的影响，西方资本主义大国甚至呼吁戈尔巴乔夫“介入”来反对罗马尼亚的革命。媒体诽谤保卫伊利埃斯库（Ion Iliescu）政府的工厂工人和矿工们也是资产阶级惶恐的表征。

反革命将在俄国和东欧面对巨大困难。一场社会爆炸正在波兰酝酿。统治阶级为此恐惧，也因此他们如坐针毡地与戈尔巴乔夫一同施行干预政策并犯下各种错误，而不是急着推倒斯大林主义政权。

反动的“一国社会主义”理论已经显示出它的无用和愚蠢。斯大林相信他已经建立了一个千年不朽的政权。他不知道几十年后这个体制会面对着多么巨大的危机。共产国际的领导人们也没有意识到他们接受这种反动理论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现在，十月革命的许多成果，包括欧洲和全世界共产国际支部的发展，都被摧毁了。各国共产党从作为国际革命的工具变成各国国家改良主义组织的残余，一个比一个更反动！在希腊，他们与在1944年至1947年的内战中镇压共产党人的保守派政府建立了联盟。在西班牙，他们已经四分五裂。即使在共产党仍然是一股力量的地方，如在意大利和法国，他们已经成为一个不是斯大林主义而是资本主义者的机构。他们面对着托洛茨基早已预测到的下场，是理所当然的。

斯大林的国际追随者及其所有继承人都是官僚外交政策的工具。现在他们仍然盲目地支持戈尔巴乔夫，尽管他正朝着复辟资本主义的方向前进。在资本主义经济繁荣的背景下，各国社会党中的左派失去方向。他们天真地跟随斯大林主义者，断言“社会主义”已经在俄国和东欧建立成功。现在他们正遭遇与斯大林主义者相同的命运。

随着资本主义的暂时复苏，右翼改良主义派气焰嚣张。他们是资本主义的低贱奴才。他们放弃了任何“社会主义”的面具。在他们所执政的法国，西班牙，瑞典，澳大利亚和纽西兰等地内，“社会党”政府执行着保守的资本主义政策。在纽西兰和澳大利亚，他们实际上已经转向去国有化。在德国，他们早就放弃了对社会主义纲领的虚伪坚持。他们在理论和实践政治上比他们在魏玛共和国的前辈更加堕落。

然而，由于这些人也处于世界市场和国际范围内相互渗透生产力的控制之下，他们的行事方针也很自然的如此演变。欧洲各国已经无法实施纯粹在一国境内的经济政策，这也是他们透过欧洲经济共同体组织（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诉求经济统一，以及其他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开始接触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原因，但他们是不会成功的。

生产力在这种相对进步的政策下得以发展，帮助了世界资本家们克服每个资本主义经济的国家限制，局部性地克服了他们先前在1929年至1933年的萧条和两次世界大战中面对的危机。现在，世界经济的发展程度已经超越了私有制和民族国家的范畴并与后两者产生巨大矛盾。这将在未来更加明显地展现出来。

实际上，资本主义世界仰赖于对殖民地和前殖民地人民的剥削。在整个1980年代，帝国主义每年从全球最贫穷的人口中榨取出5亿美元。资本家的令人厌恶的伪善之处在于，他们流着鳄鱼眼泪，虔诚地假装在利用贸易条约来压榨落后国家的同时提供人道援助：用左手给予支援，同时用右手抢回更多财富。

托洛茨基针对落后国家情势而发展出的“不断革命论”至今仍然完全正确，尽管在部分落后国家出现的斯大林主义畸形发展也在理论和前瞻上造成了新的困难。在中国，古巴等地的以斯大林主义为起始的政府将不可避免地陷入与俄国官僚目前所处的同一死路。然而，他们作为落后国家曾在一整个历史时期所促成的巨大生产力发展是无法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实现的。在这个意义上它们曾是非常进步的。在世界的三个部分，即斯大林主义世界，资本主义世界和殖民世界中，托洛茨基的理念是新兴劳工阶级势力的宝贵向导。

东欧的发展还尚未定论。东欧和俄国的情势仍然持续在发展。在东欧，“一国社会主义”的经济计划已经进入了荒谬的程度。比不上欧洲经济共同体的经济一体化水平，更不用说美国的经济一体化水平了。在发展生产力的最初阶段取得了巨大进展之后，每个斯大林主义国家都被各自推入了死胡同。他们对无法控制就连资本主义国家都能够些许控制“市场”，而工人们也没有任何对经济的控制权，这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必要条件。这个僵局反映在从波兰和匈牙利开始的斯大林主义的彻底崩溃中。就匈牙利而言，斯大林主义者们是在戈尔巴乔夫的鼓励下发起了这一进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最初几十年，官僚表现出极大的满足感和自信心。 1960年赫鲁晓夫对资本主义国家说，“我们要埋葬你们！”从技术，经济和社会角度来看，特别是在中国和东欧的帮助下，这完全是可能的。如果到目前为止他们能维持先前所取得的增长速度，那么到1980年他们就可以超过美国。但是贪婪官僚主义的腐败无能统治，以及没有工人群众直接参与的情况下，发展国有化经济是不可能的。

然而，所有资产阶级理论家和改良主义政客都认为斯大林主义制度可以永远维持下去！现在应该是坚若磐石的极权主义国家机器正在显示出它无法压制工人阶级的无能程度。

官僚们之间正在发生内讧。他们有一部分想要回到官僚极权控制的死路。另一部分希望向资本主义方向发展。随着资本主义现在已经持续了数十年的暂时复苏，他们希望复辟资本主义，或者更确切地说，即他们常提到的“市场经济”。但这项政策也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反弹。

在东欧所有国家内，尤其是在苏联本身，最引人注目的社会现象是官僚们对劳工阶级的恐惧。在官僚们中没有一个有组织性、连贯性的派系想要返回列宁和托洛茨基时代存在的工人阶级控制之下。然而，俄国和东欧工人们还尚未表态。在即将到来的东欧，西欧和世界的抗争中，革命家们还有时间一次又一次地发展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纲领。

自十月革命以来，俄国工人阶级经历了三个世代的社会发展。先前被大量农民稀释的工业工人，现在当然已完全无产化。但在很大程度上，随着老布尔什维克以及“托洛茨基主义者”们遭到的大屠杀，俄国工人也丧失了他们的意识。然而，即将出现的新政权仍有待事件和历史的考验。很快，俄国工人和东欧工人们可以重新获得并重振马克思主义及其现代等同物“托洛茨基主义”的思想。

即使在最糟糕的情况下，如果官僚得以成功建立资本主义，那么新的十月革命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会在更高的经济和社会层面上爆发。苏联从前仅有一千万名工人，现在有1.4-1.5亿人。新政权将陷入新的矛盾，特别是当资本主义危机在世界范围内发展时。

俄国革命在历史上取得了正当性，无论它在下一个时期会经历如何的变迁。列宁和托洛茨基的成就是不朽的。有了列宁和托洛茨基的思想和组织方法，无产阶级将立于不败之地。他们的反抗绝对是不可避免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欧洲，美国和日本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实际上是件好事。与战前时期的环境相比，他们无可估量地强化了无产阶级。

另一方面，国际市场的组织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过程导致资本主义得以暂时局部克服危机，但这也将极大地加剧随后阶段的危机。生产力的发展为资本主义提供了喘息的机会。但这必然会辩证性地转向其相反的方向。新的障碍，新的关税将被建立。新的世界各大权力集团已经开始现形：统一的德国和欧洲经济共同体；日本和亚洲；美国，加拿大和拉丁美洲。资本主义强权之间将形成新的甚至更剧烈的敌对关系。

世界经济相互依存的逐步发展将在某个阶段崩溃。诚如托洛茨基在《卡尔·马克思思想万岁》的前言内解释道，生产力进一步发展所造成资本聚集和集中化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将为新的巨大经济崩盘做好准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托洛茨基对“市场”的分析是正确的。事实上，资本主义依赖于工人阶级的无偿劳动本身就是将来会发展的危机的根源。资本积累的过程，或用马克思的话说，“过度积累”，本身就是未来危机的保证。

在资产阶级企图避免危机的种种动作中，出现了新的大规模矛盾。目前的“经济繁荣”非常脆弱。随着信贷，军备开支产生虚拟资本，以及通过寄生收购集中资本，统治阶级正在造就未来的危机。

然而，世界经济也透过发展出电脑，微电子和自动化科技为国际社会主义奠定了基础。现在，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和苏联完全有可能在不减薪的情况下实行6小时工作日和4天工作周。这将为无产阶级管理工业和国政提供必要的时间。

社会主义的物质，政治和社会基础已经奠定。缺乏的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和理解，以及一支能够领导劳工阶级不可避免抗争运动的群众性革命先锋队。

托洛茨基一再解释说，国际主义不是出于情感原因，而是出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现实，这是资本主义历史上的进步任务。今天，这已经达到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托洛茨基无法想像的程度。世界经济目前是一个统一经济体。这反而将为劳工阶级的巨大国际运动铺路。

现在连苏联或美国都无法孤军奋战。他们是世界经济的一部分。勃列日涅夫不得不勉强放弃斯大林对“自给自足”经济的坚持。戈尔巴乔夫进一步推动了这一进程。但他们这样做并不是为了为社会主义革命做准备。恰恰相反，他们已经向资本主义势力招手。戈尔巴乔夫依靠帝国主义势力，向科尔，密特朗，布什和撒切尔寻求援助，是托洛茨基在《保卫马克思主义》中勾勒出的“官僚阶层之日益脱离苏联无产阶级，及其日益依赖于国内外的其他阶级与集团”。（《保卫马克思主义》，“小创不治将成坏疽”）的过程的惊人证实。坐拥巨大资源的超级大国的戈尔巴乔夫，却不得不拿出乞丐的破钵！他只能期待援助，因为面对不可解决的矛盾，他走上了反革命和恢复市场即复辟资本主义的道路。

托洛茨基发展了马克思和列宁的思想，解释道，人们的活动是具有决定性质的。他在《保卫马克思主义》中写道：“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必要性的理解与宿命论无关。社会主义的实现并非‘自然而然’的预设过程，而取决于各阶级及政党有生力量的角逐

战果”。（《保卫马克思主义》，“再谈苏联的阶级性质”）马克思主义者的活动是至关重要的。没有革命组织活动，无产阶级不可避免的反抗永远不会以成功做结。

金诺克，密特朗，拉方丹，克拉西，冈萨雷斯，霍克等社会民主右翼领导人认为他们是“现实主义者”。实际上，它们并不优于目前存在的经济条件。归根究底，他们仍然是大企业的工具，被他们无法控制的力量掌握着。随着经济的变化，这帮人将在历史巨轮下一次的转动下被压垮。

过去70年的整个历史证明了托洛茨基思想的正确性。群众一次又一次走上斗争的道路。 1968年在法国爆发的革命是未来世界性运动的先兆。托洛茨基和列宁的思想，也就是诉求劳工阶级夺取政权的理念，接下来将不可避免地在工人阶级的活跃阶层和那些寻求摆脱资本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危机的认真知识分子中获得更大的认可。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西方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面孔站上台面，“开明”的大财团控制社会上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组织自由。托洛茨基解释道，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依赖于“对殖民地的掠夺”，就像“古代民主以奴隶制为基础”一样。民主无疑是资本家最方便，最灵活的统治方法。但不可避免的是，一旦群众反抗发生，各大财团将改变其策略，就像他们在战争期间采取的动作那样。要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永久维持民主制度是痴心妄想的。

如果新一轮革命失败，资本家们将不可避免地转向过去的反动手法。在匈牙利和波兰，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们已经正在谈论建立资产阶级独裁统治的必要性。波兰的瓦文萨以对抗斯大林主义极权主义起家，现在却提倡在波兰建立实际上是极权主义的制度，这是一种完全的资本专政，以迫使通过必要的变革来建立波兰的资本主义制度。实际上，资本主义将揭示其在未来时期的僵局。与此同时，我们看到了苏联的僵局。斯大林主义和资本主义都注定要失败。新的革命浪潮是不可避免，不可抗拒的。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托洛茨基的突出特点是对劳工阶级改变社会的能力和理解的信念。他们明白劳工阶级是唯一能够成功为社会主义铺路的阶级。

只有列宁和托洛茨基的纲领和方法才能满足劳工阶级的需要和利益。革命青年如果要为未来的斗争任务武装自己，他们必须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托洛茨基的理念–特别是托式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撰写的那些具有极大重要性的作品。

作为一个理论家，托洛茨基的高度可能甚于列宁。他站在列宁的肩膀上，在斯大林主义的反动时代承载着马克思主义的理念。世界各地的国际主义者们不必担心他们目前的微小势力。事件经验将教育群众。我们在反抗撒切尔人头税（Poll Tax)[3]抗争运动的经验中再次印证了这一点。利用列宁和托洛茨基的方法，我们将创造出经得起事件考验的政治力量。在托洛茨基遇害周年到来之际，我们可以向这位老人致敬，并许诺马克思主义趋势将在全世界继续他的工作。

我们感谢伟大的托洛茨基，这位为了反抗斯大林主义反革命而殉道的棋手和思想家。当劳工阶级实现社会主义时，托洛茨基将永远活在群众的记忆中。

注释

[1]作者按：孟什维克和社会主义革命党的领导人

[2]译者注：格兰特对“国家资本主义”理论曾有深入且详细的批判。请参见“反对’国家资本主义’论：答克里夫同志”（“Against the Theory of State Capitaism: A Reply to Comrade Cliff”）

[3] 译者注：由格兰特创建和提供理论领导的英国战斗派趋势（Militant Tendency）于1980年代成为英国最大规模的托洛茨基主义组织。当保守党撒切尔政府企图于1989年颁布伤害劳工阶级利益的人头税（Poll Tax）时，战斗派领先成立“全英反人头税大联盟“并成功组织百万余人抗税，并引领数十万人上街示威。这场成功的运动直接导致撒切尔下台。